

“战地记者”从江城出征

1938年，国难当头，历史赋予江城以时代使命。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一支文艺大军慨然“文章入伍”，吹响抗战号角。

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成立，一批战地记者毅然“新闻参战”，奔赴战场前线。

“青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发起，但4天后上海沦陷，著名记者范长江等人来到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爱国进步记者首次组成统一战线。

徐州会战爆发，范长江领衔第一个“战地记者采访团”出征，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津浦铁路沿线，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有力回击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

武汉作家协会老主席李蕤原名赵悔深，当年就是一名战地记者，他的回忆《我在〈大刚报〉的始末》再现难忘一幕：1938年春，徐州会战开始，在前线见到曹聚仁、范长江、陆诒、石宝珊等，个个斗志昂扬，不怕艰苦，互相支持，相互帮助，谁也不把自己采访到的材料“保密”，一扫过去新闻界“抢新闻”“垄断新闻”的旧习。大家只有一个最高目的：尽一切可能把胜利的成果告诉全国人民，激励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徐州被困，范长江带队突围负伤，历尽艰险返回江城，迅速出版《徐州突围》一书，主编“战地通讯集”和“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烽烟图景传播长城内外。

短短200天，“青记”在武汉留下不凡足迹。

江汉路宁波里12号，总会驻地联络接待外国记者斯诺、爱泼斯坦、罗果夫、莫塞安、黎蒙、马菊恩、华伦等人及日本作家鹿地亘，提供线索，安排采访，护送上前线，争取国际舆论声援。

宁波里门口的“普海春”西菜馆，总会组织4次大型集会，范长江介绍前线战况，史沫特莱报告游击区情势，战地记者交流经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屡屡发出正义之声。

江汉路长春里5号二楼，“记者之家”敞开温暖怀抱，为战地记者写稿子、译电码、发电报提供条件，迎来几乎所有知名记者，会员发展到近2000人。

交易街口济世总里，《新闻记者》创刊，7个月坚持出版7期，一方战时交流思想、探讨业务的园地，给战地记者插上新闻理论的翅膀。

武汉保卫战打响，“青记”紧急设立“战地报纸供应部”，把《新华日报》《大公报》《大刚报》《武汉日报》送往阵地，鼓舞前方将士斗志。

烽火岁月，彪炳史册。194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以“青记”为光荣前身。2000年，国务院设立“中国记者节”，日子定在“青记”创立的11月8日。2018年11月8日，“青记”成立80周年之际，历史陈列馆在汉口交易街口开馆揭牌。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战地记者”从江城出征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95，武汉四中承办全国中运会 / 罗建华

风雨同舟

<<< <

12 在议政建言中实现人生价值 / 袁言勇

九城同心

<<< <

16 有勇有谋韩先楚

——听韩卫平谈父亲韩先楚将军 / 周晓冬

委员天地

<<< <

21 当好基层教育的“守望者” / 沈 嫔

24 “透明”直播间照亮新职业之路

/ 陶 军（口述） 章旷怡（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27 年轮里的城乡园林梦 / 邹彦奇 (口述) 柳姣娇 (整理)

烽火江城



31 浴血山河：抗战烽火遗迹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一 / 邓正兵 王 钢
39 大别烽烟 (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八 / 涂文学

人物述林



46 张良皋抗战时期求学重庆
/ 张 眺 (口述) 雷敏功 (整理)

都市寻踪



52 汉阳龟山赤壁画馆 / 张智海
55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五) / 刘宝森

扫街探疑



60 大陆村地名溯源 / 张 均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95，武汉四中承办全国中运会

◇ 罗建华

轮印：1995 和 2015 年，武汉四中相继承办全国和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国内外开创先例，扩大了武汉在全国和世界的影响。这所百年老校经过时代洗礼，拥有全国第一家“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全国唯一“中国中学生田径训练基地”。

如果不是收藏了这么一张邮品，哪会想到一次中学生运动会竟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由增添几分庄严。画面上，五星国旗映着两个运动员的头像，女生的长发飘逸出六只仙鹤。第六届，六只仙鹤，灵动着黄鹤楼的美好传说，极富青春动感和城市韵律。

邮品标注“湖北·武汉 1995.8.26”，时光飞越整整 30 年，历史现场回到一所中学校园。

武汉四中，1995 年 8 月 26 日—31 日，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武汉首次承办的国家级综合性运动会。

武汉四中，2015 年 6 月 27 日—7 月 2 日，世界第二十二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武汉首次迎来的世界级运动会。

相隔 20 年，同一所中学，为何两次有此殊荣？





“少帅”张学良率足球队到访

汉口解放大道上首，每当轻轨从汉西站掠过，窗外一所壮观的运动场刷亮双眼，巍峨的钟楼标识出“武汉四中·博学中学”。

1899年，博学书院在花楼街创办。1908年，博学书院迁来现址建成新校舍。1928年，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博学书院更名为私立博学中学。1952年，博学中学申请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武汉第四男子中学。

1967年11岁时，搬家到解放大道水厂路旁，看得见钟楼的尖塔，听得见悠扬的钟声，知道那是“四男中”，足球特厉害，赛跑呱呱叫。到“四男中”去踢足球，到“四男中”去穿跑鞋，是周边男孩的狂欢和荣光。第一次见识“四男中”，碰上的恰好是足球赛，还是越南国家队来访，小伙伴蜂拥前往观看，没想到足球场是那么气派。

1969年，梦想成真进了“四男中”，不过从这一届开始实行男女

生合校，但校园依然阳刚之气爆棚，女生也活跃矫健。首次组建女篮、女排校队，竟然在硚口区打出冠军之威，胜过男篮、男排校队。男队自有足球独占鳌头，每逢课余，运动场上人头攒动、身影闪动、足球滚动、喝彩轰动……一派龙腾虎跃，定格为挥之不去的记忆画面。

一条法桐林荫大道从校门直通到底，将200余亩校园一分为二，右手南北两个大操场，左手钟楼旁、教堂前一溜篮球、排球、网球场。钟楼后的合围裙楼，一边为室内体操馆，一边是音乐阶梯教室，而阶梯教室外连着游泳池。

南操场最为壮观，400米8股跑道环绕足球场，两头球门后横卧着跳远沙坑，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可与新华路体育场媲美。曾几何时，日军占领武汉，校园变成野战医院，四角修起四个碉堡，操场圈为军马场横遭践踏，游泳池沦为伤兵澡堂几近废弛。

这些来自于班主任陈震老师，他担任体育教研组长，兼任校足球队教练（1988





1965年，武汉四中足球队合影，后排左一为陈震

年任硚口区民盟主委、1990年任硚口区政协副主席），爱“吹”校史过往和体育骄傲。一次在他家开班委会，他搬出一摞资料，展示他两次带领校队远征全国青少年足球赛的战绩。1964年，赢得武汉市足球赛冠军，代表武汉赴青岛，在20个城市中名列前九。1965年更上一层楼，夺得全省足球赛冠军，代表湖北赴大连，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跃入前七。凯旋之后，湖北省组建足球三队培养新苗，一次从校队选拔6名球员。

四中的足球有其传统，《武汉四中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告诉我们：国际奥委会1900年将足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01年武汉“博学”“博文”“文华”三校即举办足球联赛，在武汉地区首开先河，其中“博学”崭露头角。1921年左右，来自“足球之乡”的英国海军足球队上门，连日比试负多胜少。1933年，汉口租界洋人组织多国联队“红队”再度挑战，仍是铩羽而归。

《武汉志》记载，1934年“少帅”张学良任武汉行营主任，亲率东北大学生队慕名来访，败北后感叹“大学生打不过中学生”，接见“博学”足球队中锋万业文以示嘉许。

万业文可谓传奇人物，是陈震老师的老师，外号“万铁腿”，射门劲爆，名不虚传。1947年，万业文回到母校当足球教练。1949年5月，组织足球队“护校”迎接解放，此后大显身手。1957年，兼任武汉军区足球队主教练，率队参加全军首届运动会，

告捷凯旋。随后，首批入选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兼田径裁判，主哨省市重大比赛。

同样在1957年，四中校门挂上国家“足球重点中学”牌匾，以足球为龙头，体育教学与体育竞技，双双呈现蓬勃兴旺之势。即使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也挤出“铜板”，为每班配置一个足球。虽然，运动场已种满了红苕充粮度荒，但路旁林间照样踢球，显示顽强的生命力。

1974年至1984年之间，武汉四中校队横扫市一级所有比赛，捧回12个金杯、5个银杯，在体育界传为佳话，声誉远播海外。检索武汉数字方志馆“教育大事记”等史料，不乏记载：

1985年，武汉友好城市日本大分市“体育之翼”访华团来访，武汉市副市长高顺龄到校，主持足球、田径两大比赛。

1986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健康顾问雷富夫妇来访，兴致勃勃观摩了一节体育课。

2006年4月26日，亚洲足球联合会主席哈曼、秘书长维拉潘率领30余名官员来访，参加“中国展望——足球项目试点学校”授牌仪式，随后观看足球友谊赛。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挥毫题词

足球是圆的，操场是方的，方圆之间任驰骋，体育健将层出不穷。

1957届学生李必华进入湖北省田径队，1959年全国运动会打响首届发令枪，李必华打响人生发令枪，揽入百米短跑冠军奖杯。此后一发而不可收，1961年和1963年，在全国两届田径运动会连获冠军。1965年，中国、越南田径友谊赛在武汉举行，又以10秒2的成绩打破10秒3的全国记录，进入世界百米短跑前十名。

1968届学生刘卫平进入湖北省皮划艇队，5次夺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亚洲运动会金牌。1982年，湖北省命名武汉四中为“传统项目先进集体”，特邀刘卫平到命名大会作专题报告。

改革开放年代，武汉四中打造足球、田径、游泳三张体育名片，从1987年到1995年，一路问鼎湖北和全国大赛，夺得团体冠军6项、亚军3项，单项冠军75项、亚军63项。

如此群星闪耀，牵动体育界最高层的眼光，国家体委、中华体育总会的荣高棠、邹时炎、何振梁等领导相继来校视察。1989年2月19日，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莅临南操场，他出身军旅身材壮硕，见到正在训练的高个子小运动员邹波，欣然上前与之握手。邹波恰好是我妻子的表弟，不久到广州军区体工大队报到。

伍绍祖临别，欣然挥毫为武汉四中题词“学练结合，培养人才”。

武汉四中培养的人才，源源不断走向全国。据全国中运会前的10年间统计，共有90多人入选市、省、国家三级专业队，其中足球就有12人跨入国家队，组织一支“国脚队”也不在话下，多位队员退役后任省市足球队主教练。1993年，刘麟、王文华等“留学”巴西队，开始把母校的名字写进世界足球史。

足球出类拔萃，田径当仁不让，创办全国第一家中学生俱乐部，取得市、省、全国、世界四级比赛团体总分第一的大满贯。1987年以来，达国家一级和二级田径运动员标准的有近百人。每年，平均向高校输送运动员15人以上。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角逐，学校拿下“三连冠”；全国体育教师“十佳”评选，田径教练黄仲藩上榜；“全国群众体育活动先进代表”赴京，副校长萧熊章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接见。



1989年2月，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视察武汉四中

一路跑来，武汉四中跻身全国足球传统学校、全国优秀田径试点学校、全国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

体育界权威人士称赞高水平运动场

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在武汉四中开赛，这是武汉市首次承办全国性体育盛会，由国家教委、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当年，上海、成都、大连等城市，纷纷与武汉竞争“东道主”，最后花落武汉四中。

回溯前五届中运会，一色由城市承办并在城市运动场馆举行，甚至跨省、跨市、跨年度运作。1973年第一届，分别在两省两市——吉林长春、山东烟台举行。1986年第三届，分别在一省两市——辽宁鞍山、营口举行。1987年、1989年第四届，两年中分别在两省两市——四川成都、河北唐山举行。

武汉四中一次包揽赛场，南操场建成我国中学第一个国际标准田径运动场。

验收之前，请来湖北省体工大队和各高校的100多名运动员试跑，这些见过世面的高手捷足先登，无不蹦、跳、跨、跃，兴致勃勃感慨“这是个能出好成绩的好场子”。

验收时刻，国家教委体卫司司长宋尽贤率领体育界权威人士实地踏访鉴定后，不由交口称赞：我们到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中学考察或讲学，这样高水平的运动场难得一见。

田径场中央铺满“中华结绿草”犹如地毯，四周400米标准塑胶跑道颇为讲究——



120米为上坡道，280米为下坡道，8个跑道也有倾斜度，保证竞赛条件的均等。东西增设两个看台，可容纳5000观众。

北操场耸立一座多功能体育馆，室内高度净空13米，高于国际标准的12.5米，可同时举行3场排球比赛，并能举办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武术比赛。

8月26日至31日，全国中运会硝烟燃起，来自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运动小将，参加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四大项目比赛。武汉四中组队代表武汉上阵，取得大面积丰收，李德刚荣获百米短跑冠军。

开幕式主席台上，笔者巧遇作为嘉宾的陈震老师，一同目睹盛况。当天日记记载：“今天，四中举行中运会田径赛的入场式，我在主席台上与班主任陈震老师长谈。此前8月18日，我采写特稿《武汉四中向全国“亮相”》，发表在长江日报《长江周末》一版，算是对母校的一点回报。”

第二年秋，儿子升学到武汉四中，不久参加家长会，特意到南操场看台前留个影，为母校而骄傲。

武汉四中运动场馆由此名声远扬，2005



年迎来武汉市第七届运动会，2007年又成为全国第六届城市运动会赛场。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授牌“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全国首家。2012年，教育部授牌“中国中学生田径训练基地”，全国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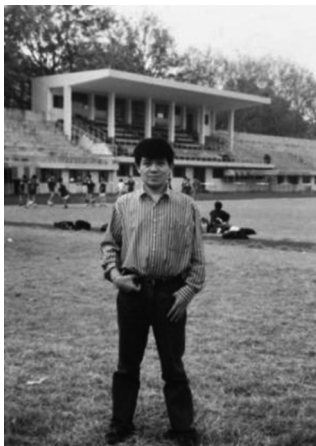
终于，第二十二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田径锦标赛 2015 年来到武汉四中。

老校友袁隆平提议申办世界中运会

1939 年春，“博学”因武汉沦陷而迁往四川，先入江津，后落重庆。袁隆平一家从湖南逃难，辗转到了重庆，哥哥 1943 年进入“博学”上高一，觉得办学质量不错，让 13 岁的弟弟转学来校读初一。袁隆平就此与武汉四中结缘，直至 1947 年从汉口随家转学至南京。

2009 年，武汉四中 110 周年校庆，袁隆平院士回到母校，79 岁的老人家对一切记忆犹新：“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确实不浅，至今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

《武汉四中史话》收录袁



隆平的一篇忆文，讲述的故事颇具戏剧性：“1947 年 6 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 10 余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

师周庆宣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没有体力，不行！次日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10 多个彪形大汉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地奔向市内某游泳池。为了贪玩和看热闹，我偷偷地跳上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上。待到达预赛场时，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本人在内），我竟获 100 米和 400 米自由泳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教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母校增添了光彩。回校时受到热烈欢



武汉四中校史馆的袁隆平（左一）泳装照



袁隆平参加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

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多次。”

袁隆平指着校史馆一张老照片说：“最左边这个就是我，当时才17岁，个子是小。”因此，他在给年轻的学弟学妹作报告时，不忘寄语大家“将来要有所成就，必须先练好身体”。他自豪地描述自己——“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

是啊，一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78岁的袁隆平担当湖南001号火炬手，手持第一棒，奔跑步履轻松。

这次回到母校，袁隆平深感运动场馆远远今

非昔比，惊讶“拥有8000个座位的标准田径场”，提议承办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田径锦标赛。

2015年，袁隆平再次重返母校时，出席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式——这不仅是武汉首场承办的世界级赛事，更是这一赛事首次走出欧洲、走进亚洲。武汉四中，为整个亚洲创造了“破零”记录。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让2000余名肤色不同的运动员涌入武汉四中校园，他们惊喜于钟楼的古老，更惊喜于运动场馆的现代。

殊不知，为迎接这次世界青春盛会，武汉四中场馆再度升级，很多项目比照北京奥运会“鸟巢”标准进行。如重新铺设跑道时，就采用了与“鸟巢”一样的材料——国际一流荔枝纹预制型塑胶卷材，能在多种恶劣气候情况下，仍然满足比赛条件。

赛前，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杨坤伦（Jan Coolen）来校考察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果断预言：“场地条件符合比赛要求，届时的成功将会证明我们选择武汉四中



2015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式



西班牙代表队在武汉四中校园

是正确的。”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秘书长杨立国也表示，由一所中学来承办这一世界赛事，国内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此外，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武汉四中从1993年起5次代表中国，赴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波兰、捷克参加角逐，捷报频传：一次团体总分冠军，一次金牌总数第一名，16名世界冠军。

2005年，女队出征葡萄牙，夺得团体冠军，捧回金牌总数第一“学校金杯”，7名学生夺得4块金牌、2块银牌、1块铜牌，其中罗丽娟获跨栏冠军、罗文获三级跳冠军。

2007年，男队出征法国，夺得团体第5名和金牌总数第三，其中董文崇获110米跨栏冠军。

袁隆平高兴地看到，母校的目标并非“锦标主义”而是“全员健身”，叫响“人人有特长、个个能参赛”的口号。每年春秋两季运动会，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群体活动，为学生培养“强健的体魄、智慧的头脑、温暖的心灵”。

“体教融合”“国际化”“多赛道”办学——正如袁隆平题词“继承理科特色，发

扬英语优势，保持体育传统，创建全国名校”所言，武汉四中坚持“全面发展加特色”，春色满园又一枝独秀，教研并进而巅峰突起。

在武汉四中校史馆，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校友，见到一个个奖牌闪烁光华——全国校园文化建设先进学校、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学校、全国体卫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百佳特

色学校、湖北省示范学校……竖立前行地标，刷新百年传奇。



1995—2025，30年日月如梭，这张首日封新鲜如昨，小黄鹤高举火炬昂首奋进，正是一所中学和一座城市，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精彩亮相。

罗建华，长江日报高级编辑，武汉四中校友

在议政建言中实现人生价值

◇ 袁言勇

人物名片：袁言勇，民进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工委主委、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市政协委员，汉南区政协常委。

我 2008 年 6 月加入民进，至今 17 年，从认识党派地位作用，到成为参政议政骨干，在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中不断收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我先后报送社情民意信息百余篇，获评民进全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每每想起那些自己曾经提出的意见建议，最终转化为政府法规、政策、部署或者举措，我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

以议政建言促进本职工作

在本职工作中，我们最能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听到群众的意见呼声。但很多体制机制性问题自身并不能解决，有些建议也不能通过常规渠道上达成为上级决策参考。于

是参政议政便成为一种有效途径，并且立足本职工作的建言献策，往往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前瞻及时，一旦被采用反过来会促进本职工作开展。但立足本职工作参政议政，需要善于窥斑见豹、吹糠见米，从个性问题发掘共性问题 and 体制机制问题。

我在区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期间，有不少社会研究机构发布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及城市排名，很多都使用了交通区位、经济总量等不符合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给基层工作造成很大困扰。为此，我于 2020 年 12 月撰写提交《第三方机构营商环境评价应予规范》社情民意信息，建议规范第三方机构营商环境评价，规定其不得发布与国家统一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或者与《条例》精神不符的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1 年，又进一步修改后提交信息《应避免泛化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范畴》。

2021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



袁言勇（中）参加政协论坛

要求第三方机构不得借营商环境评价开展有偿培训等活动。6月国办发文，规定第三方机构不得以“中国”“全国”等冠名发布有关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该社情民意信息分别获评民进中央2022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三等奖、2022年度民进湖北省委会优秀社情民意信息。

到区大数据中心工作后，我依托本职工作取得多项参政议政成果。2021年，我提出《关于加快建设全市统一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议》，“武汉市企业服务一站直通”平台于2022年7月29日试点运行，提供惠企政策统一发布、政策精准匹配、政策直达快享、企呼我应等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并于2023年6月正式投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先后被抽调到区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高速公路检测点等直接参与防控工作。深入一线的工作经历和调研议政的工作习惯，使我发现了很多影响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的问题，先后提出约30件社情民意信息。

2020年疫情初期，我发现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没有纳入集中隔离管理，而当时他们实际感染的风险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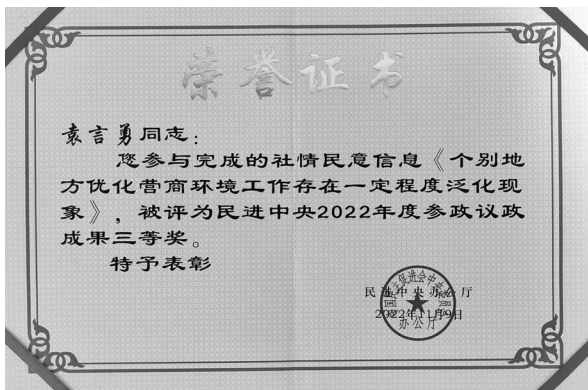
为此我于2月份撰写《加强潜在密切接触者管理刻不容缓》，建议将这两类人员均按直接密接者标准纳入集中隔离，助力武汉加快打赢防控战役，后于当年9月被正式写入国家第7版《疫情防控指南》。2022年我在值守高速防疫检测点时，由于查验车上人员是否已经采样不便，于是3月12日提出《关于及时将核酸采样信息录入健康码系统的建议》，到3月26日，武汉健康码系统即实现于采样半小时后显示“已采样”。

以议政建言助力经济发展

党外人士和政协委员履职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而经济建设就是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大局。围绕经济建设建言献策，要特别注重前瞻性和可行性的统一，尤其是要突出前瞻性，当风险还未发生时，引起重视纳入决策视野；当问题已经显现但尚未找到应对之策时，提供“解题”思路；在决策拍板阶段，关注潜在问题，预防决策失误。

我们知道，汽车是武汉、湖北的支柱产业。但目前本地汽车产业在国家汽车产业集群中的地位下行，缘于转型升级出现了“醒得早、起得晚”的问题。2017年我初任市政协委员时，就提出《关于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建议》提案，针对当时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滑坡的情况，建议牢牢把握汽车产业新能源化的发展方向，加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出台地方政策大力支持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如果说新能源化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上半场，智能化、网联化则被普遍认为是产业竞赛的下半场。针对我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获 2022 年度民进中央参政议政成果三等奖

升级下半场开局并未取得明显优势的情况，我于 2022 年深入调研，执笔撰写《关于加强“双智”联动，加快“双智”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报送《关于加快双智协同，推进双智产业发展的建议》并作为区政协大会发言，2023 年初又修改并转化为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加快“双智”协同发展的建议》，获时任市长程用文签批，同时获评民进湖北省委会市级组织优秀参政议政成果奖，被评为市委统战部优秀参政建言。

此外，我于 2009 年撰写《关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两型”农业建设的建议》，获评民进湖北省委会年度十佳信息。2015 年参与撰写《建设工业大数据系统工程势在必行》，获得全国政协《政协信息》采用。2022 年主笔《关于加大芯片产业发展力度助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同年 11 月武汉市出台《促进车规级芯片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2023 年撰写《关于加快全面开放信控灯态数据的建议》获省民进采用，相关建议正在落实。

以议政建言改善社会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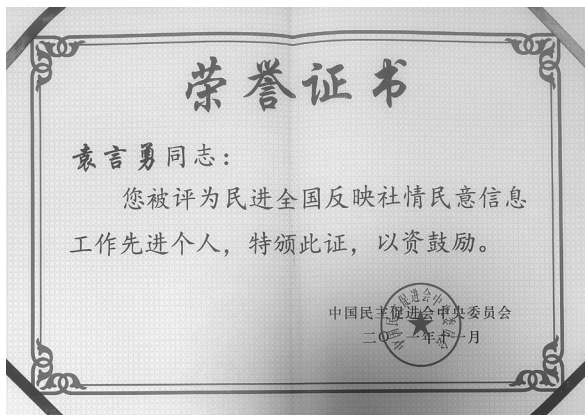
民主党派给了我们反映社情民意的平台和渠道，作为党外人士和政协委员，通过

议政建言改善社会民生，我们义不容辞。

2011 年，反复发生的全国性“菜贱伤农”悲剧再次出现，中央二台连续播出相关新闻。我是农民的儿子，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当时又在农业部门工作，经过调研，我撰写了《关于建设农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议》获《武汉重要信息》采用。

《建议》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当时政府性农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失效，农业数据公开共享度不高，更没有充分利用其进行综合分析，用准确的供求信息对比引导农业生产和经营，由此导致产前农民缺指导、产中信息欠测报、事先政府无应对，建议建设数据全面完整、分析测报功能强大的农业信息化公共云服务平台，以数据分析结果为资源池向各级农业部门和农民用户提供按需服务，形成全国农业资源和信息互联共享的服务网络，实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宏观调控指导、及时提供信息、提前介入应对等功能，最大限度避免供过于求“菜贱伤农”。

我还持续关注水体污染治理工作。2011 年撰写的《关于加快马影河综合整治的建议》，被评为区政协年度重点提案、优秀提案。武汉经开区持续投入，对马影河实施综合治理，开展排口改造、岸线整治、景观绿



被评为 2021 年度民进全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化等工程，马影河水质逐步提升，现已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

2014年我撰写的《关于综合治理纱帽河和泥湖河的建议》，被评为区政协大会优秀发言并转化为提案，2016年底被区政协转化为建议案。经过多年治理，曾经脏乱污臭的两河实现水清岸绿景美。2019年8月，经武汉市水体提质攻坚办组织评估验收，达到“长治久清”的治理目标，两河河岸建设成为市民喜爱的休闲绿道。

此外，我于2013年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汉南区人民群众急盼解决“出行难”问题》，获得时任副市长刘立勇批示，助推汉南顺利开通两条城市公交。2018年，我主笔完成的《关于加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力度，确保我市扶贫工作“脱真贫”“真脱贫”的建议》，被省政协采用。2020年，我撰写的《将抛荒与休耕混为一谈现象应引起重视》，被全国政协采用，获评民进武汉市委年度十佳参政议政成果等。

以议政建言助力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然而，“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通过议政建言推动深化改革，既是参政议政难点所在，也是个人价值彰显之处。

2019年，我在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期间，针对建设工程图审中介产生机制不合理、图审资料收受机制不完善、图审中介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撰写《关于建立“淘宝式”建设工程图审中介服

务及监管工作平台的建议》，提出建设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实行施工图审线上服务和监管，将图审中介机构作为“淘宝店铺”双向自选，设置“查看进度”“用户评价”“政府评价”“信用管理”等功能，被全国政协办公厅单篇采用。2020年6月，住建部批准深圳开展建筑工程人工智能审图试点。2021年5月，钟祥在湖北省政务服务网“上线”首家县级网上中介超市。

2023年，针对愈演愈烈的内卷内耗式地方招商引资，我撰写《是时候管管内卷内耗的地方招商引资了》，指出其存在同质竞争扰乱全国统一大市场、高昂成本加剧地方性财政压力、不公政策妨碍中小微企业发展、虚耗公帑并影响高质量发展、马太效应制约中国式共同富裕等危害，建议建立规范公平透明市场竞争环境，包括划定地方招商引资的政策红线，明确权限、范围和力度，细化税收和土地出让金返还、租金减免、项目定制、投资补贴等各方面的禁止情形，并加强督查监管，坚决遏制内耗内卷招商引资活动等。

2024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其中第十条针对各地税收优惠和财政奖补做出明确规定，纳入审查范围，要求不得含有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

有勇有谋韩先楚

——听韩卫平谈父亲韩先楚将军

◇ 周晓冬

1987年5月18日，作为《红安报》记者的我，曾有幸参加韩先楚将军骨灰在红安烈士陵园的安放仪式。



2007年12月5日，作者与韩卫平（右）合影

2007年12月5日，韩将军的四子韩卫平来到红安黄麻起义纪念园，瞻仰韩先楚墓。在这次与韩卫平的交谈中，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的友谊。17年间，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交流，缅怀韩司令的丰功伟绩。韩卫平大哥每次来红安都通知我，见见面、聊聊天。每次聊天，我都要求韩大哥谈谈韩司令，听听他眼中的韩司令。

“同意韩先楚副司令的意见”

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四保临江作战中，3纵司令员曾克林和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分别任总指挥、副总指挥。1947年3月，在第四次保卫临江

作战时，在仗怎么打的问题上，曾克林和韩先楚发生分歧。

曾克林主张“柿子先拣软的捏”，先打较弱的暂20师。因为，暂编20师是云南的部队，战力一般，位于外翼侧，配合89师行动。他认为应该集中兵力歼灭该师，从外翼侧一步一步打下去，比较稳妥和有把握，成功之后再扩大战果。而韩先楚坚持“擒贼先擒王”，先打89师。因为该师是这次敌人主要进攻的一路，消灭了它，就可能全面粉碎敌人的进攻。

曾克林担心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北有敌暂20师、184师，南有新22师、52军2师，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人增援上来，我军有被围的危险。韩先楚则认为，89师刚从热河调来，人生地不熟，不了解我军作战特点；过去一直与我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作战，没吃过大亏，盲目骄傲，急于冒进。南路的新22师和52军2师距离较远，北路暂20师和184师可由3纵9师顶住。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四纵作战科长肖剑飞出了个主意，由两人各自起草电报，上报辽东军区，请首长定夺。两个小时后，陈云和萧劲光签名复电：“同意韩先楚副司令的意见”，并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纵、4纵协同作战。

事实证明，陈云、萧劲光的决策是英明的，而韩先楚更是凭借“临江保卫战”一战成名，并在东北得了“旋风司令”的称号。

“就由我带队上去吧”

1949年12月6日，两广战役胜利结束。12月18日，依照毛主席电令，第四野战军将攻打海南岛的任务交给12兵团40军

和15兵团43军。正式成立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统一领导下，15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

1950年2月1日至2日，15兵团在广州召开40军、43军和琼崖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叶剑英首先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及四野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他指着作战地图说：“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十分繁忙，但对海南岛作战仍十分关注，20多天连发三封电报，很多具体问题都考虑到了，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接着，叶剑英请刚渡海过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介绍了海南岛敌我情势。

会议讨论较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渡海工具。有人主张到港澳买登陆艇，有人提议将帆船改装成机帆船，有人坚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

韩先楚长时间没有发言。一是他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对渡海作战虽然有了基本路数，但还缺乏实践检测，没有达到胸有成竹的地步；二是他的一些想法与毛主席的指示不吻合，这就更使得他出言须谨慎。

韩先楚想，港澳当局是倾向国民党的，会卖登陆艇给我们，让我们去打他们的盟友吗？改装机帆船是必要的，但能改装多少？毛主席1月10日电报指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在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显然，毛主席对到底能改装多少机帆船，也是心存疑虑。何况大马力发动机数量有限，顶多占渡海作战船只的五分之一。那

就只有依靠帆船了，帆船就得依靠北风，而北风、东北风只有清明、谷雨季节才有，过了谷雨就刮南风了。

当符振中讲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建议先进行小部队偷渡时，韩先楚非常赞同，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岛上力量对比，增强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还能取得渡海作战的经验，提高部队渡海作战的信心。

韩先楚终于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在谈到金门战役失败时，就讲过第10兵团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各自为战，无统一指挥，并要求我们要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由我带队上去吧。叶剑英同意了，这成了在当天会议中唯一一个无人争议的议题。

越过四级的电报

在3月12日、21日两次向上级建议谷雨前发起渡海作战的电报无果后，4月7日凌晨，彻夜未眠的韩先楚字斟句酌地给中央军委和四野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并抄送15兵团。这是一封很长的电报，也是对海南岛战役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电报。

关于电报的原文，已经无从查证，如今只能从韩先楚的自传中看到相关内容：“我们认为，继续偷渡对我不利，因敌已摸到我规律，偷渡一次比一次困难，一次比一次损失大，而且我军大规模渡海作战已经准备好了，大规模渡海比偷渡好处多，大规模渡海战役与偷渡是同样多的敌飞机和敌军舰。渡过同样长的海峡……”在电报的结尾，韩先楚

写到：“40军已经准备好并决定发起进攻，如果43军未准备好，我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保证解放海南岛！”

这不仅仅是一封电报，更是立下的一道军令状。虽说韩先楚的胆大和直言敢谏是出了名的，但是作为一名兵团副司令，敢于明确否决上级的作战计划，并且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捅到中央军委，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这份勇气，源于他实地调查研究后作出的“谷雨前必须打海南”科学决断。

在15兵团韩先楚是客军，按说他向上级陈述意见未被采纳，也就算了；可他清楚一旦自己这时退让，后果是什么。他更清楚，如果不将自己的意见越级上报，是说服不了15兵团领导的。所以他才在明知道会得罪人的前提下，于4月7日凌晨发出这样一封电报，以12兵团副司令韩先楚个人名义直



解放海南岛首长合影（前排右二为韩先楚）



1981年10月下旬，韩先楚在红安县上新集镇复兴村吴家嘴湾与当地村民在一起

接发给四野和中央军委。

在电报中韩先楚强调，如果谷雨前不发起海南战役，就没有机会了。电报为什么急于在4月7日发出呢，因为他很清楚这样一封通天的电报是需要时间决策的，4月20日转眼就到，再不发出就来不及了。韩先楚更知道，要想让中央军委下定进攻海南的决心，必须发出军令状式的电报。

身在广州40军留守处的刘芷来信劝告韩先楚，就按邓司令的意见等买来登陆艇再打嘛。金门距大陆只有几公里的几个小岛，叶飞都拿不下来，要攻打远离大陆一百多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岛，你要考虑后果啊！

韩先楚这封越过雷州半岛15兵团前指、广东军区、驻武汉四野等多级，直达中央军委的电报，转至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席手里。很快最高统帅就发回电报，肯定了大举登陆的意见。1950年4月10日，经毛泽东

主席、中央军委、四野首长批准，15军团向40军、43军下达大规模渡海作战命令，此时距离谷雨只有10天了！

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隔断台湾海峡。如果没有韩先楚决意求战，海南岛也许成为今天的第二个台海。打下海南岛后，群众发现韩先楚独自一人面对大海坐了一夜，谁也不知道将军在想什么……

著名军事学者金一南将军曾感慨道：“我们过去说过，万幸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今天还要加一句：万幸有韩先楚这样的战将！”

1974年11月，韩先楚因肾结石在301医院手术取石后出院，中央军委派专机送他到海南岛修养。12月的一天，韩先楚来到临高海岸登高远眺，他在回忆海南岛战役时说，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是主要的。要从实际出发，实事实是，积极更好地贯彻中央意图；指挥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在战争年代尤为重要。

红安、郴县的争吵声

1950年4月15日，15兵团司令员邓华来到40军，走进韩先楚搭建在海边草棚子的临时指挥所。直到这个时候，邓华依然认为应该组织小规模偷渡，这样损失更小，更有把握。而韩先楚胸有成竹，坚持认为应在谷雨前登陆，因为他把琼州海峡的潮汐、风向、水流和季风的规律摸透了。

随着两人交谈的深入，在进攻海南岛的战机选择上发生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座木头搭建的棚子里，爆出了湖北红安、湖南郴县两地方言激烈的争吵声。

一会儿争吵停止了，侦察科长郑需凡被叫了进去，郑科长看见这两位四野名将都铁青着脸，站在一边不敢吱声。邓华劈头就是



毛泽东主席与韩先楚亲切握手

一句：“你敢保证谷雨前没有南风，有北风、东北风？这个错了杀你的头！”郑需凡挺直胸膛一字一句说：“我保证谷雨前没有南风，这个错了杀我头！”随着这一斩钉截铁的保证，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

郑需凡作为韩先楚最得力的下属之一，他的侦察完全贯彻了韩先楚“到前面去”的原则。从琼州的徐闻到海南岛的临高角，他已经带人来来回回摸了好几遍。面对如此执着的司令和尽责的侦查科长，邓华最后说：“话已至此，那就登陆吧！”当天晚上，韩先楚又命令郑需凡带船过海，将临高角一带海面的风向、风力、水深、流速及帆船行进速度等数据，又重新测量、检查了一遍。

1950年4月16日，一个值得共和国铭记的日子。当晚在雷州半岛最南端的灯角楼海边，40军118师、119师、120师358团共18700多名指战员，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带领下，登上沿着十余里弯曲海岸线排开的300余艘双桅双蓬木船。

蓝天白云，白帆红旗，桅墙如林。指战员高唱战歌，跨越海峡，直捣海角天涯。

记得韩卫平大哥曾经跟我讲过，韩先楚将军在临终之际，嘱咐他们给他穿上军装，把他的骨灰送回生他、养他和战斗过的家乡——红安。

“一生征战天下的他，最后回来了，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红安，与父母亲，与红二十五军将士们永远在一起了。他一人悄然而至，走累了，褪去军装，只穿了一件白衬衣坐在裸子山顶，心潮澎湃。当年那些激战的地方，那些目中无人骄横的敌军被围歼的一幅画页又幡然打开，目视远方，静静地思考为人民，为他辛勤耕耘的这支军队，也憧憬着未来。

就这么在山顶上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凉风袭来。他还忆起了童年时光，在山上放牛，扔石头打仗咣咣……，石头飞过山崖划出了一条美丽的弧线，他轰鸣爆烈的一生竟就这样，在那一瞬间，化成了永恒。大别山那高天厚土安息着他们伟岸的身躯，更孕育着崇高的精神。我仰望高高的山峰，云顶上只有‘光辉’。

安息吧，我亲爱的父亲。”

这是韩卫平大哥2021年4月5日回红安，为父亲扫墓回北京后写下并发我的。

周晓冬，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原《红安报》总编室主任，红安县政协第九届、十届常委，县政协研究室原主任

当好基层教育的“守望者”

◇ 沈 嫔

人物名片：沈嫔，市政协委员，新洲区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

我的教育人生，恰似东坡词境中的“一张琴，一壶茶，一溪云”。这琴，是终身执着的教育事业；这茶，是浸润其中的教育日常，平淡中自有回甘；这云，便是那份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教育情怀。

校园方寸之地，教师青春易逝，但育人的情怀却如溪流般绵长不息。学生如流水般来了又去，我们教师便是那河岸的“守望者”，在匆匆时光中，默默雕琢着人性的光泽与人格的基石，既成就学生，亦丰盈自身。

守望成长，璞玉终成器

二十六载教师路，我深信每个孩子都是一块独特的璞玉，蕴藏着无限可能，只待慧眼识珍、匠心雕琢。记忆回溯至2011年，那时我怀着身孕，仍坚守在班主任的岗位上，同时还兼着备课组长的职责。在强烈的

工作责任心驱使下，我坚持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到校值日，晚自习巡查完才回家。

当时班中有个叫小皓的男孩子，频繁逃课，是众人眼中的“问题少年”。深入了解后，方知其叛逆的根源在于破碎的家庭。父母离异，仅靠年迈的祖辈照料，内心长期缺失关爱与认同，对学业乃至生活都失去了信心。

一次，他又不知所踪。我忧虑如焚，让丈夫骑摩托车载着行动不便的我，穿行于街巷四处搜寻。最终，在一处昏暗网吧的角落，我们找到了他。当他抬眼看见气喘吁吁、汗湿衣衫、腹部高隆的我，眼眶瞬间湿润了。那一刻，我触摸到他心底的柔软。

此后，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与他谈心，悉心发掘他身上的闪光点，让他真切感受到师长的善意与期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皓被这份执着所感化，渐渐褪去顽劣，最终顺利考入普通高中。此情此景，尤胜甘饴。它让我更加笃信：教育的真谛在于永不放弃的守望，以心暖心，再坚硬的“顽石”也能被温情唤醒，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这份对个体的守望，也延伸到我作为年级管理者的责任上。我们学校规模大，一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往往就相当于别处一所学校的体量。在担任全面负责年级管理的副校长后，我深知肩头担子的分量重了许多。立德树人始终是我工作的根本，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是重中之重。我常以“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自省，要求自己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年级工作千头万绪，我坚持虚心听取年级老师、其他行政同仁以及家长们的意见，遇事集体商议，集思广益。唯有不断创新思路，才能充分调动起老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管理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此，我几乎“以校为家”，师生未到，我已在校门守望；师生尽散，我才踏着星光离开。陪学生进出食堂，陪伴他们走过教室长廊，同进退，共出入。做师生最坚实的后盾和最知心的伙伴，这份默默的守候，是我无悔的选择。

欣慰的是，我所带领的教师团队，勇于奉献、乐于拼搏；学生们在“五育并举”中健康成长，学业成绩稳居前列，各项活动异彩纷呈，共同书写着一届又一届的辉煌篇章。守护每一个个体的成长，亦要守护好这方育人的沃土与同行的伙伴，这便是我作为“守望者”的双重使命。

守望课堂，平凡里闯出不凡

身处农村学校，硬件与师资的局限，常使我们在大赛中难有建树。2014年，武汉市举办汉字听写大赛，作为语文教研组长兼辅导教师，我深感重任在肩。如何选拔良才，



蹲点九年级毕业班“中考百日誓师”大会讲话

如何高效训练而不耽误学业，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区赛中突围，最终在市决赛中争得一席之地？那段时日，思虑萦怀。

我虚心向区语委办彭主任求教，归来后便凝聚组内十二位同仁之力，分工协作，从语文课本到《现代汉语词典》《通用汉字规范表》，广泛搜集、整理、归纳易错字、同音异义字、易混淆字。每日大课间那珍贵的五十分钟，成了我们的“练武场”。老师们轮番上阵，以报听写的形式训练学生，不仅要求准确，更强调书写的规范与美观。课后，全体语文教师又埋首于批改与订正。

天道酬勤，我们学校六名学生披荆斩棘，从新洲区脱颖而出，与全市十九支劲旅角逐半决赛，最终我校作为新城区唯一代表闯入武汉市六强。电视直播的决赛舞台上，我们这所远郊学校，与武汉外校、华师一附中等名校同台竞技，最终斩获团体三等奖，并有一名学生勇夺个人亚军。

这不仅刷新了新洲区语文团体赛事的最佳纪录，更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焰。它昭示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怀揣卓越之心，勇于突破桎梏，将日常之事做到极致，同样能在基层的土壤中，谱写不凡的华章！

守望未来，为孩子们“代言”

教师与管理者之外，我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身份——武汉市政协委员。这方议政平台，赋予我更大的责任，也让我得以更响亮地为基层教育、为孩子们权益发声。

履职五年多来，我提交提案 25 件，建议 20 余条，其中多篇被采纳并产生实效。我立足本职，积极参与偏远地区送教、留守儿童帮扶、为贫困山区儿童捐书等公益活动。通过调研，撰写了《关于妥善处理农村闲置学校的建议》《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监管和心理防护的建议》和《认真落实农村学校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的建议》等文稿，积极为基层教育建言献策。

我撰写的提案《让无情体罚出局，有情惩戒归位》等被省政协立案。撰写的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加强农村中小学非统考学科教育的建议》《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应“三管齐下”》，有幸被省政协采纳上报。

我尤为关注的是构建“儿童友好学校”蓝图。秉持“以童为本”理念，致力于重塑教育服务：

首先是安全包容，打造和谐友好环境。完善校园及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加强制度建设，开展近视和疾病预防宣教，严格食品安全管理。

其次是协同育人，推动资源深度联动。推动学校设施周末和节假日向社区开放，制定使用规则和预约制度。学校与社区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健康体检等活动。

然后是平等发展，关注特殊儿童群体。在流动儿童集中区域增建公办学校，落实随



武汉市委统战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表演朗诵《我们是民进人》

迁子女入学“同城待遇”。加强普特融合，建立特殊需求儿童家庭支持小组。

最后是多元融合，构建课程活动体系。开展跨学科实践教育，开发“武汉特色”校本课程和特色研学路线。

在政协大会的发言席上、在《政协论坛》的镜头前，我一次次阐述这些理念与实践，目睹建言逐渐化为惠及师生的现实。这份参与感，是教师角色之外，又一份沉甸甸的喜悦与荣光。

时光荏苒，二十余载弹指一挥间。我依然选择扎根在这片基层教育的沃土上。惊天动地的伟业或许无缘，但日复一日的守护与付出，却让我内心无比充盈。

教育之路，或许尘土沾衣，或许步履维艰。然而，当凝望学生眼眸，那里面闪烁的求知光芒、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如同璀璨的星辰大海，刹那间便能照亮所有的疲惫与辛劳。我愿继续在这片育人的园圃里，静待每一朵花儿，安然绽放。

“透明”直播间照亮新职业之路

◇ 陶 军（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陶军，新洲区政协委员，武汉聚星久娱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24年7月31日，国家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了19个新职业，“网络主播”赫然在列。这意味着，经过多年互联网的“野蛮生长”，主播这一身份正式得到国家承认，成为一门正规职业。此时，我已在直播行业深耕多年。回望来路，我的故事关乎跨界转型的决然、对行业规范的执着，以及最终沉淀下来的那份社会责任感。

打造“透明”直播间

2010年前后，我在阳逻做快递，发现电商包装市场需求巨大，而供应端跟不上，商家常为找个合适尺寸的纸箱发愁。于是，

我和朋友一起创立玖誉包装，专门为电商客户提供规格合适的纸箱。厂子不大，但生意稳定。

那时互联网的风已悄然刮起，看着日新月异的线上世界，我意识到仅仅做这个世界的“包装工”还不够。考虑良久后，决定跨界做互联网直播。当时是2018年，直播的风口已经清晰可见，整个行业充满活力却也鱼龙混杂，“网红”这个词，常常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我没像很多早期玩家那样躲在犄角旮旯里偷偷运营，而是反其道而行，把直播间开进了阳逻当地最热闹的摩尔城商场。透明的玻璃幕墙后，公司主播、运营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很多人表示不解，说成本高、干扰多，但我追求的正是这份“透明”。以此告诉所有人，直播不是见不得光的行业，

它可以堂堂正正立在阳光下，成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和商业模式。

起步是艰难的。摸索运营模式、招募培养素人主播，一切都得靠自己慢慢来。我永远记得那些场景：一位年轻的妈妈，利用孩子午睡的两小时上播，用歌声和真诚的聊天赚取一份补贴家用的收入，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一个原本在厂里沉默寡言的工人，在镜头前找到表达的自信，虽然笨拙却充满热情。

我深切感受到，这方小小的屏幕，这些看似虚拟的光影，真的能照亮现实中普通人的路，给他们带来改变的可能。这比单纯包装纸箱带来的满足感，更复杂，也更触动人心。

行业爆发得比想象中更快，公司签约的主播一度接近 7000 人，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五十多个运营点。纸箱厂的轰鸣声犹在耳畔，而直播间的灯光，已经照亮了一片新天地。

在网络喧嚣中坚守规则

直播这行，常被贴上“浮夸”“混乱”的标签。但在我眼中，它托起了许多普通人摇摇欲坠的生活。

一位修脚师主播让我印象深刻。她相貌平平，直播间却总比唱歌跳舞的还热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爱看那双巧手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她靠这每月稳定进账几千元。在无数不被看见的角落，直播悄然撑起了生计的屋檐。

然而，流量至上的法则下，直播行业的乱象也令人忧心。最刺痛我的，是看到那些真正有才艺、肯吃苦的主播，嗓子喊哑了，



新洲区网络人士联谊会成立

在镜头前站几个小时用心带货，收入却可能比不上某些靠打擦边球、制造噱头博眼球的人。此外，过度追求流量导致的主播健康问题、价值观扭曲，也时有发生。

在公司内部，我们率先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所有直播间实行 24 小时监控，内容强制存档。一旦发生争议或纠纷，便有据可查，既保护主播也保护用户，更重要的是约束我们自己。

同时，我要求核心运营团队必须持证上岗——考取经纪人资格证。别小看这张证，题库三千多道题，涵盖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社会价值观、平台规则方方面面，难度不小。我自己就考了两年才通过，深知它的分量。这不仅仅是应付监管，更是让团队真正理解行业的边界和责任。现在，我们公司 80% 的核心运营都持证上岗，这在业内是不多见的。

当看到“网络主播”首次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当各项监管政策日益明晰完善，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行业洗牌是痛苦的，一些习惯了“野路子”的玩家会被淘汰，短期阵痛难免。但从长远来看，只有规则清晰

了、底线守住了，那些真正有内容、有才华、愿意踏实做事的人，才能赢得持久的尊重和市场。喧嚣终会沉淀，留下的应是价值。

屏幕微光托举万家灯火

当直播褪去最初的狂热，回归相对平稳的发展期，一个问题愈发清晰地摆在我面前：聚星久娱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签约主播的数量，还是流水和利润？对我而言，这些数字固然重要，但绝非全部。真正的价值，在于这间公司、这个行业，能为屏幕前后的普通人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我常常想起公司里那些宝妈主播的面孔。她们是社会的“夹心层”，需要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时间和精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对她们而言几乎是奢望。而直播间灵活的时段安排，给了她们一个珍贵的可能——在繁琐的家务和育儿之外，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凭借自己的努力，能赚取一份体面的收入。

她们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特别是在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这份弹性工作机会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薪水那么简单。这份“托举”的力量，是我们存在的深层意义之一。

作为政协委员，这个身份赋予我的不仅是政治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2023年6月的一天，我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活动，来到潘塘街李店小学。当我将300本卷面书写本和500本专项习字本递到孩子们手中，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欣喜，一种别样的情感涌上心头。这份责任，不仅在



向潘塘街李店小学捐赠图书

于关爱眼前的孩子，更在于为他们、为所有乡亲守护并点亮家乡的未来。

家乡新洲不缺乏文化宝藏，缺的是被看见的机会。像涨渡湖、凤凰古寨这样的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完全具备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潜力。经过调研分析，我提交了《整合新媒体力量赋能乡村旅游》提案，建议政府牵头，汇聚本地新媒体从业者的力量，系统挖掘、包装、推广这些资源。这不仅仅是商业机会，更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为那些留守的乡亲创造更多的就业可能，也让更多人认识新洲、爱上新洲。

直播的形式或许会变，技术会迭代，但人们对于连接、认同的渴望是永恒的。提供一个灵活就业岗位，捐赠一本习字本，为家乡文旅发展尽一份力……这些点滴汇聚起来，就是聚星久娱扎根、生长、赢得未来的根本。

年轮里的城乡园林梦

◇ 邹彦奇（口述） 柳姣矫（整理）

人物名片：邹彦奇，湖北公安人，武汉绿雅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洪山企业联合会会长。

四季轮转成就年轮，百味杂陈方为人生。树的年轮不可缺失任何季节，因春夏秋冬皆为经历；人的一生不能缺少任何况味，因酸甜苦辣皆是回忆。

1987年，我离开江汉平原，来到华中农业大学求学。199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夏区金水农场。彼时的武汉，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我也开启了与这座城市三十多年的情缘。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初到金水农场，我被分配到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时，人均工资不过百多元，但单位对我的培养堪称“大手笔”——每年拨出数千元送我参加全国林业技术培训。

从南方丘陵的柑橘栽培到平原的湖区防护林建设，从土壤检测到树种选育，这段经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林业的认知大门。在多数人还在为温饱奔波时，我超前意识到，林业不仅仅是“种树护林”的简单概念，而是涵盖生态修复、城市美化、碳汇经济的综合产业，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在金水农场的这段日子，让我与武汉的“绿”结下了不解之缘。

90年代，香港新世界财团进入武汉。当时，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刚起步，而香港企业的全球化视野与精细化管理模式，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作为项目中方代表，我深度参与了新世界在武汉的多个项目。香港团队带来的“全球布局、风险管控”理念让我印象深刻，其项目决策需经过多轮风险评估，资产负债率始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种“稳字当头”“长周期、慢经营”的风格与当时内地企业“求大求快”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市场的繁荣与萧条是交替出现的，而真正的商业机会往往隐藏在周期的转换之中。因此，港资企业更加注重在周期低谷时积累实力，为未来的爆发做好充分准备。一家优秀的企业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与打磨，而良好的口碑则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

在管理上，他们把精益生产、“瘦”型管理做到极致，各类人员的配置十分精简，一专多能、一人多职，企业内部看不到闲人。

合作中我学会了如何制定项目里程碑计划，如何与跨国供应商谈判，甚至如何处理跨文化团队的沟通问题。当然文化上的差异让我也有过短暂迷茫，但我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这段四五年的外资管理经历，为我后来创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苗圃不好我就自己种”

2002年，我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辞去稳定工作，与两位合伙人踏上创业征程。创业第一年，我们接了五个小项目，其中最小的一个项目额仅8000元——为一家单位院落种植几株桂花树。我们连夜驾驶三轮车奔赴百里外的咸宁苗圃，在泥泞小路上颠簸十多个小时，只为抢在晨露凝结前将树苗运抵现场。

还有一个园林施工的项目，因甲方临时要求增加排水系统，我们为了节约成本，用借来的旧推车运送砂石。合伙人老李的手掌被碎石划开10公分口子，忍着剧痛用创可贴裹着继续操作。项目完工后，客户惊叹“没想到这么小的活也能做的这么讲究”，随后将单位所有绿化项目都交给了我们。这



绿雅园林的园艺作品

种“接一个成一个”的口碑，让我们在武汉绿化圈逐渐有了名气。

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因发展理念分歧，我们三位合伙人决定和平分手。往东还是往西，走哪条路都没错，但不能同时走两条路，这不是妥协，而是对专业方向的聚焦。他们两人分了车和票子，我选择继续经营公司。如今回望，这次分裂恰似园林中的“间伐”——看似砍去枝桠，实则让主干获得更充沛的养分。这条“做精不做泛”的路，最终让绿雅在细分领域筑起一道坚实的壁垒。

同年，我抓住城市高速建设的机遇，承接了多个市政和房地产园林工程。为了确保苗木质量，我跑遍湖北各地苗圃，发现桂花树冠幅参差不齐，香樟主干布满虫眼，更遑论色叶植物的稀缺。本地苗木存在“品种单一、品相参差”的问题。苗木质量不佳是我的一块心病，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客户资源，如果因苗木质量问题而流失，那真是得不偿失。

如果自己做苗圃、自己把关，是不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说干就干，一番调研后我在江夏、天门、公安三地建立苗圃基地。农

村没有现代化设备，就用锄头翻出标准化的种植畦；缺乏专业人才，就跟着电视台农业频道学修剪技术。记得在天门基地，为培育出符合标准的彩叶苗木，我们连续 40 天蹲守苗床，用游标卡尺测量每株新芽的生长数据。

正是这次近乎偏执的垂直整合，让绿雅园林在行业粗放发展的年代，不仅解决了项目供应问题，更是率先在行业内筑起了品质的护城河。后来公司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项目接连不断，为了掌握进度和把控质量，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执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品控管理制度，让客户对合作省心、对过程放心、对效果动心。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二十年来，我的思想、认知甚至于习惯和爱好都发生了些微改变，但有一点从创业到现在从未变过——只有高质量才能让企业得以生存，只有高品质才能让企业得以迅猛发展。

经过二十多载刻苦经营，公司的员工由最初的 3 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拥有一大批园林景观设计、施工的管理行家和能工巧匠，数百家劳务合作群，无地域、无边界的材料资源动态数据库，实现了园林、市政、装修、古建、环保、生态等产业各环节资源的整合。

二十多年时间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业和积累的阶段，更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阶段。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命运。纵使眼前的发展势头再好，但经营的危机感始终伴随着我，因为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当今的商业环境，平均每 2—3 年就会产生一样新



邹彦奇当选洪山企业联合会会长

生事物。唯有不断突破、拓展自己的眼界与能力边界，人生才能越走越开阔，价值和财富才会越积累越多。2007 年，我就走进武汉大学经管院学习，持续更新管理思维，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和迎接未来变化。

2019 年，我组织全体员工赴日本游学，开拓眼界，与日本优秀园林企业深度交流，探讨园林细节的极致追求。不定期分批次组织员工赴江浙地区学习传统的园林技艺，身临其境感受苏杭地区园林的设计风格和施工工艺，领略苏杭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的魅力。在建筑行业普遍陷入低迷时，我们始终将“开放学习”作为突破口，通过管理工具迭代，实施项目推演和人材机精细化管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实现降本增效。

我鼓励员工突破自己，去做难事，相信做难事必有所得。公司培育的肯打硬仗、敢啃骨头的作风，让绿雅园林赢得了行业和社会各界赞誉，也让我们书写了更多优质作品。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徐州园博园、昆明轨道交通 5 号线配套工程、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山体生态修复、羊楼洞古镇等工程，树立起了绿雅园林的良好口碑。

2020 年，公司更名为武汉绿雅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每年都有多个项目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质工程金奖、湖北省风景园林学会优质工程金奖、武汉市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协会优质工程金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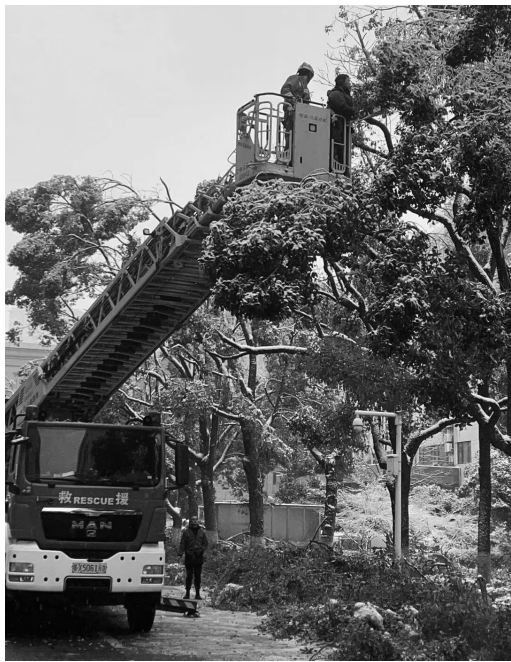
“扎根土地，向阳而生”

2024年，武汉市洪山企业联合会换届，推选我为新一届会长。工作之余大多数时间我都用来拓展会员活动，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平台，在企联内部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为响应武汉市对口帮扶号召，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会内企业向建始县捐赠资金和物资共计59万元。2025年，在洪山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我就武汉市营商环境优化、企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建言献策，提出加大对行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改善措施，建议构建“问题穿透”机制，建立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邀请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等，获得区委区政府肯定。

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来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虽然企业家也要创造利润，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促进社会进步。从商以来，不管是事业处于低谷还是高潮，无论生意顺畅还是资金吃紧，我都秉承着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信念，坚定地怀抱一颗感恩的心，坚持与责任共生。

绿雅园林每年拿出利润的10%用于公益绿化，2021年开始我们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莲溪寺进行景观改造及养护，让我们与城市的关系从“利益关联”升华为“情感联结”。2024年，武汉市野芷



2024年武汉冻雨灾害中，绿雅人积极进行应急处理

湖公园改造升级，我们免费投入人力物力，将其打造成为洪山区公园标杆。莲溪寺的梵音与野芷湖的碧波，共同见证着绿雅园林的社会责任。商业向善的力量，让城市发展留下文明的温度。

站在2025年的门槛回望，我从一个外地青年成长为带领数百人团队的企业家，绿雅园林也从“5个小项目”发展为全国布局的园林集团。这条路，我们走得艰难，却也踏实。有人说，民营企业是“草根经济”，但我想说：草根的生命力，在于扎根土地、向阳而生。

在武汉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城市，绿雅园林用二十年时间证明：民营企业的担当，不仅在于创造利润，更在于以专业之力修复生态、以责任之心温暖城市、以学习之姿引领未来。未来，绿雅园林将继续用专业与责任，书写城市的绿色篇章。

浴血山河：抗战烽火遗迹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一

◇ 邓正兵 王 钢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部分机构在武汉开始办公，中国抗战进入武汉抗战时期。

从狭义上讲，武汉抗战包括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保卫大武汉”而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做的大会战、总宣传、总动员，以及各阶层人民为保卫武汉而进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为期一年。这一年，不仅是中国抗战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是中国文化界聚集力量进行文化抗战

的辉煌期，是中国工厂内迁国力保存的关键期。中国战场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

从广义上讲，武汉抗战则包括从1937年11月到1945年9月武汉光复，中国军民为了保卫和光复武汉，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斗争和救亡运动，为期八年。虽然武汉沦陷，但是，中国军民及武汉民众并未屈服。中国军队尤其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周边坚持对日斗争，给日伪在武汉的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也给沦陷中的武汉民众以鼓舞和希望。1945年9月18日，华中日军在

武汉向中国军队投降，武汉光复。历史又一次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八年武汉抗战，涌现了众多抗日英雄，留下了众多抗战遗迹。2014、2015、2020年，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先后公布三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与武汉有关系的英烈有官楚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路东总队政治委员）、郝梦龄（国军第九军军长）、高志航（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张自忠（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杨学诚（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委等职）、叶辅平（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王楨祥（国军第12军20师副师长）、冯安邦（国军第42军军长）、朱炎晖（国军第94军85师546旅旅长）、范荇（国军第54军198师副师长）、刘家麒（国军第54师师长）等人，其中项英、杨学诚、刘家麒是武汉人，其他英烈在抗战期间或在武汉工作，或在武汉牺牲。同时，国务院公布了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山舰博物馆列入名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巡礼武汉抗战遗迹，重温历史现场，对于重建武汉抗战历史记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颂扬中国军民团结御侮的英勇壮举，突显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中的战略转折点，昭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从而丰富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使之成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武汉篇章的精神坐标和动力源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计划中，武汉是其重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增兵武汉，并在日租界内不断举行军事演习。武汉地方军事当局积极应对，1932年11月，即制定《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又在武汉周边及城内修筑了多处多种军事设施。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中，武汉军民积极支持抗战，郝梦龄、刘家麒、王铭章等抗战英烈的灵柩或遗骸路过或归葬武汉，一次次激发民众爱国热潮。

1938年1月，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武汉上空开始了激烈的空战。随后开始的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武汉会战尾期，中国军队在岱家山、白浒山的战斗，捍卫了中国军队和武汉城市的尊严。武汉沦陷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新洲涨渡湖、黄陂姚



1938年武汉“二·一八”空战后，建功的部分中国空军将士合影

家山、江夏梁子湖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在武汉及华中的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并取得了侏儒山战役的胜利。武汉地区的抗日烽火遗迹，既体现了武汉抗战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墓：武汉上空的鹰

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墓，位于洪山区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安葬着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英勇殉国的12位空军烈士：1月4日牺牲的中尉分队长宋恩儒、少尉飞行员张若翼，2月18日牺牲的上尉大队长李桂丹、上尉队长吕基淳、少尉飞行员李鹏翔、少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飞行员王怡，4月29日牺牲的少尉飞行员陈怀民，5月31日牺牲的空军四大队二十一分队长张效贤、中尉分队长杨慎贤、中尉飞行员孙金鉴，7月21日牺牲的空军七大队十二队队长安家驹。

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和日军进行了多次空战，其中“二·一八”“四

·二九”“五·三一”“八·三”空战规模较大，共击落敌机80余架。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也有数十名空军将士血洒长空。烈士遗骸最先安葬武昌桂子山，后因筹建华中师范大学迁往石门峰。2005年石门峰烈士墓得到修复，2011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同时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的还有南湖飞机场指挥中心旧址，位于武昌区恒安路75号，始建于1936年3月。南湖飞机场曾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基地，在武汉抗战中是中国空军的主要飞机场之一。中国空军在武汉的另外一个王家墩机场，位于今武汉中央商务区内，现已无存。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异国英魂血洒武汉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位于江岸区解放公园东北。1951年，武汉市政府在汉口中山大道陈怀民路原“万国公墓”埋有苏联

空军志愿队烈士骨骸处修建烈士墓，并建成烈士纪念碑与墓碑。1956年，在解放公园内重新修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陵园。1979年，列为湖北省第一批文保单位。2019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国家重点文保单位。

1937年11月，中国空军首个苏联志愿大队成立。到1941年，苏联向中国派遣各类空军志愿人员包括飞行员、领航员、



中国抗日空军烈士纪念碑



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舒斯特尔

射击士、机械师等共3665人。1937年8月到1938年底，中苏空军共击落敌机221架，炸毁敌机179架。1937年至1941年，在中国牺牲并安葬于中国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共214人。2015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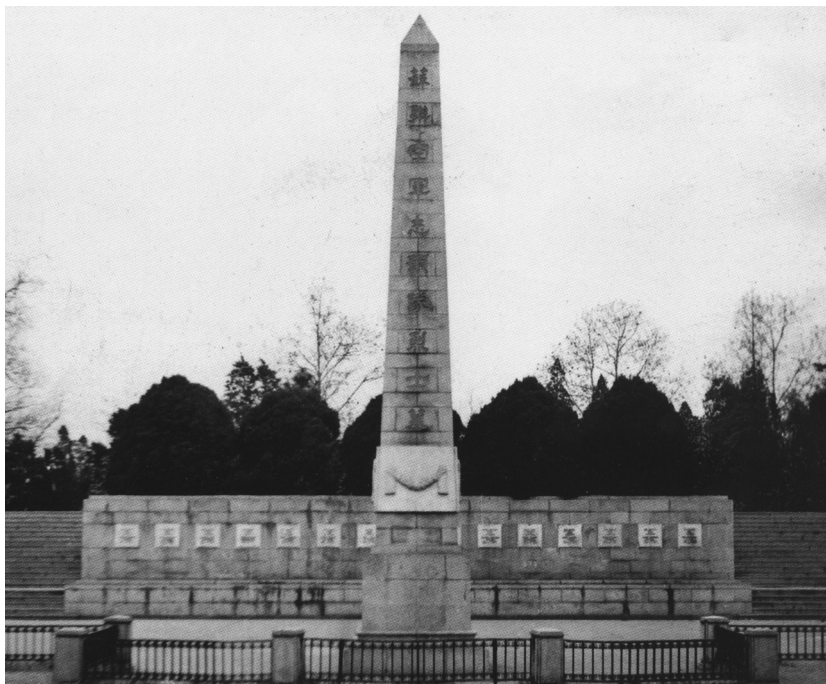
和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共同确认，除15位安葬在解放公园苏军烈士墓中的烈士外，新发现14位苏联空军志愿队成员在武汉空战中牺牲并安葬在武汉。中俄两国共同决定，将这14位烈士的名字增刻到苏军烈士墓碑上。

白浒山炮台：保卫武昌的最后一战

白浒山，位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左岭镇境内，海拔只有150米，山下就是长江由北向南转为由西向东的拐弯处，扼守长江，地势险要，素有“汉门锁钥”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战略要地。1938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在白浒山与日军进行激烈炮战，给狂妄的日军有力一击。2011年3月21日，白浒山炮台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汉地方军事当局制定一系列城防计划方案，构建武汉城防战备系统，白浒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据

点。1938年初，白浒山炮兵阵地工事构筑完毕。10月下旬，日军进逼武汉。20日下午3时，蒋介石亲赴白浒山，视察阵地工事。23-25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白浒山进行激烈炮战，一度逼退日军10公里。白浒山炮台陷落后，10月28日至11月1日，日军专门派出调查组，多次来此实地勘察，查看中国炮台的布防情况，检查日军炮击的命中率，这也印证了白浒山炮战给予日军重创程度之大。



1956年刚建成时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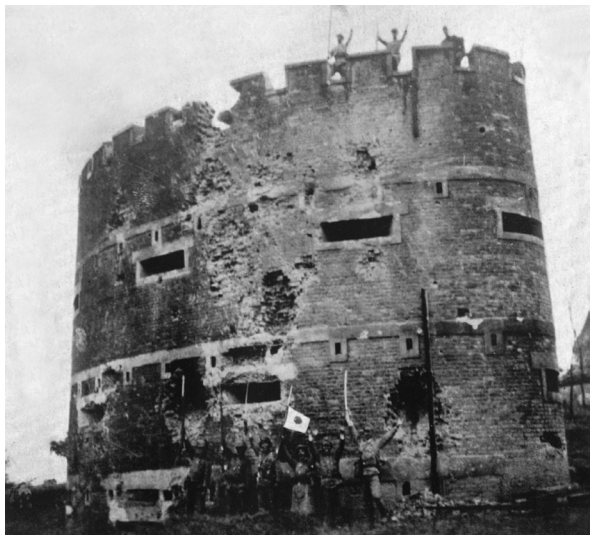


白浒山炮台

汉口碉堡群：保卫汉口的最后一战

汉口碉堡群，主要集中于江岸区，包括头道街碉堡、建设大道武汉晚报社前碉堡、张公堤附近碉堡等。这些碉堡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修筑，全面抗战爆发后进一步修葺加固，在武汉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3月21日，汉口碉堡群列为武汉市第五批文保单位。

张公堤附近碉堡群之主碉堡警备汉口



1938年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佐野支队突破汉口以北岱家山，占领蓬字守望台

区蓬字守望台碉堡共3层，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可供一个排驻防。这座主碉堡附近有十多个大小不一的碉堡，全有地道相通，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此与日军展开激战，迟滞了日军进入汉口的步伐，此战也编入日军出版的《小战例集》。2009年，因修建三环线，蓬字守望台及部分碉堡拆除。

武汉晚报社前“武字碉”修筑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当时，中国军队在汉口日本租界西北修筑永久钢筋混凝土碉堡四座，对其形成包围之势，分别是：武字碉——位于杨森花园、鸣字碉——位于赵家条、济字碉——位于纪念塔、时字碉——位于唐家墩。日军进攻武汉之前，给士兵下发《武汉三镇列国权益及重要施設图》，重点标注了这四座碉堡及其位置。1941年，伪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调查清理武汉地区各类工事，最后编制《武汉核心区工事清册》，这四座碉堡重新编定为“族字碉”“民字碉”“抗字碉”“战字碉”，内含“民族抗战”四字，这说明伪政权内也有反日情绪或抗日志士。



汉口碉堡群之“武字碉”

黄陂姚家山村：武汉抗战第一村

黄陂姚家山村，位于黄陂区西北的小悟山区，自1940年初至抗战胜利，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机关常来此驻扎，仅1943年就达半年之久。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旧址，1998年5月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2014年列为湖北省第六批文保单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确定“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后，李先念奉命从延安南下，开展敌后抗日斗争。至194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以李先念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1至4月，豫鄂挺进纵队三进三出，成功控制大小悟山地区。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等首次进驻姚家山村。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组建不久，师部即进驻姚家山村。今天的姚家山村，仍遗存新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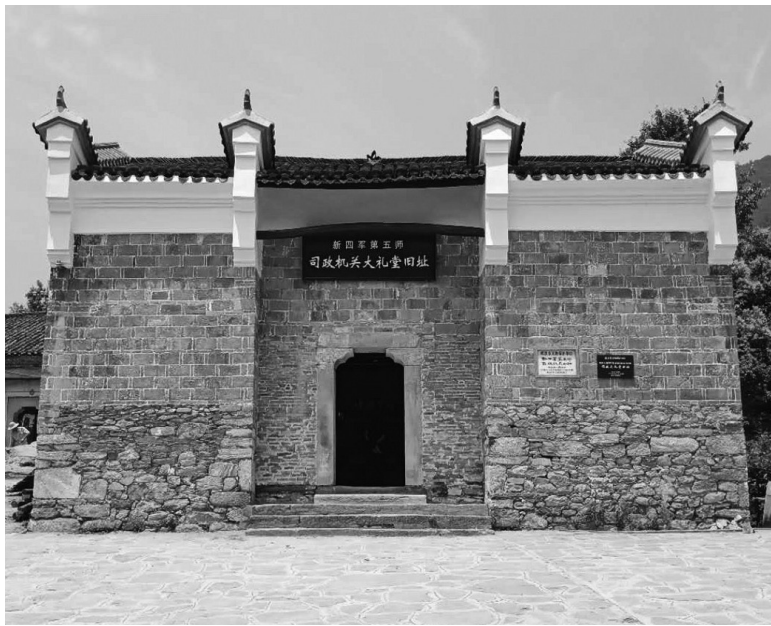
第五师司政机关旧址群，包括司政大礼堂旧址、李先念旧居、陈少敏旧居及后勤部（被服厂）、参谋部、印刷厂（边币厂）、枪械所、医务室、造弹厂旧址等9处建筑。

侏儒山战役遗址：华中敌后战场的著名战役发生地

侏儒山，位于蔡甸区西部，据川（汉川）、汉（汉阳，今蔡甸）、沔（沔阳，今仙桃）三地交界，因其北部的丘陵山峦低矮蜿蜒而得名，自古即有“汉皋西阙，云土东屏”之誉，成为控扼江汉平原进出武汉的门户。1941年11月17日至1942年2月4日，新四军第五师发起的侏儒山战役，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16个著名战役之一，与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黄桥战役等齐名。原址现建有侏儒山抗战纪念馆和侏儒山战役博物馆。2023年12月6日，侏儒山战役遗址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

1941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鉴于武汉周边日军兵力空虚，刚完成组建的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情况，以相当兵力深入武汉近郊汉阳敌后，加紧开辟川汉沔地区，为下一步向以洪湖老苏区为中心的襄南发展建立桥头堡。任务由主要在襄西、天汉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具体负责。

侏儒山战役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第一次开展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共歼伪军5000余人（包括俘950余人），毙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大礼堂旧址



侏儒山抗战纪念馆



朱立文烈士雕像

伤亡日军 200 余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侏儒山战役中，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副旅长兼四十三团团长朱立文英勇牺牲，是新四军第五师抗战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员。2014 年 9 月，朱立文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朱立文烈士墓列为汉南区文保单位。

涨渡湖抗日根据地：坚守在武汉敌后的抗战前哨

涨渡湖，位于新洲区南部双柳街南湖畈村，因“涨水为渡、落水为湖”而得名。1939 年 9 月，文祥、漆少川等带领鄂东独立五大队三营，从黄冈龙王山突围到将军山，随后转移到涨渡湖莲湖畈，会同新四军五大队大队长张体学在涨渡湖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一批后方机关进驻涨渡湖地区，先后举办培训班，创建学校、银行、印钞厂、医院、兵工

厂、被服厂和《七七报》。作为直接威慑武汉日军的抗日前哨，涨渡湖抗日根据地付出巨大的牺牲，土地上掩埋的烈士共计 500 余人。

涨渡湖抗日民主根据地是长期孤悬敌后的鄂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新四军第五师东进鄂皖边的前进阵地。2003 年，新洲在莲湖畈建立了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纪念碑，碑名由抗战时期在此战斗过的

原中共长江地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题写。2023 年，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纪念碑列为新洲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纪念碑

梁子湖抗日根据地：砥柱鄂南

梁子湖抗日根据地，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和鄂州市梁子湖一带，遗迹众多。武汉境内，有位于江夏梁子湖风景区内的保福天子山烈士纪念碑。鄂州境内，有张家楼房，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岛梁子镇。1944-1946年，鄂南抗日指挥机关、鄂东军分区司令部、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部驻此。1984年10月，张家楼房列为鄂州市文保单位；2008年4月，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公山碉堡，位于张家楼房不远处的梁子岛后山，为鄂南抗日游击队1939年所建，是抗击日寇保护梁子岛的防御工事，现为鄂州市文保单位。2020年9月，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鄂南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旧址鄂州市沙窝乡麻羊埡入选。

1938年10月，中共武昌区委利用缴获的一些枪支，在保福祠组建了一支小型游击队。后因离敌人据点太近没有回旋余地，把



梁子湖保福天子山烈士纪念碑



鄂州梁子湖梁子镇张家楼房

发展立足点改为鄂城涂家垸镇。11月，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成立。

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是在党领导下的鄂南第一支初具规模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4月，发展到500余人、400多条枪，活动范围北抵鄂城梁子湖一带，东到沙咀，南及咸宁余花坪，西到武昌西梁子湖一带。游击大队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攻，不及一年即告解体，队员转入附近继续坚持抗战活动，保福祠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此后，张体学带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以梁子湖为中心，建立咸武鄂（咸宁、武昌、鄂州）抗日民主根据地，保福祠成为主力部队在鄂南山地作战的补给线，成为新四军第五师指战员自江北进入鄂南山地的安全走廊。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大别烽烟（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八

◇ 涂文学

日军在8月28、29日占领六安、霍山后，兵分两路，左路第13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南下进入湖北，直逼武汉，发生了富金山战役和沙窝—小界岭战役；右路则以第10师团西进，向固始、潢川推进，指向罗山、信阳，爆发了潢川保卫战和信（阳）罗（山）战役

潢川保卫战

按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的计划，日军沿淮河南岸向西推进，攻占固始和潢川，其重要战略目标是阻止中国军队在信阳、武胜关的布防，迅速占领信阳截断平汉铁路，

并由信阳南下，从东、南、北三面合围武汉。但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此开始并没给予足够重视，以为其进攻重点在长江两岸，大别山北麓一线不过“支线作战而已”。因此，固始、潢川地区防卫十分空虚，直至9月初日军第10师团从六安、霍山大举西进后，方才紧急调第59军军长张自忠及第71军61师赴固始布防。

第10师团冈田支队在8月28日占领六安后，即于翌日晚上强渡淠河向固始急进。当时黄河决口后导致淮河泛滥，道路泥泞不堪，加之第五战区对六安—商城—光州一线道路予以破坏，每隔一段挖一大沟，给敌



张自忠将军

军前进造成很大困难。“道路情况比预料的还坏，特别是六安附近的道路完全破坏，车辆部队追赶第一线极为困难。因此，第10师团特别将必需的部队改编成驮马，以利作战”。“军为求得交通，补给万全，决定对庐州—六安—叶家集—商城—光州大道及庐州—桃镇—六安大道进行道路管理，给野战运输司令官配属独立工兵队、后备工兵队、道路建筑队，努力维持道路”。（《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2）。

9月3日，冈田支队到达石佛店，4日黎明渡过史河，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守卫固始南大桥及华祖庙第71军61师发动进攻，并占领南大桥。5日，击败固始以东外围阵地的国军，兵临固始城下。6日，第13师团向守卫在刘家岗、三里岗、石门口等处的第61、36、114师发起猛烈进攻，国军虽

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刘家岗仍然失守。6日早晨，日军攻城开始，守备县城的第71军181旅奋勇抵抗，但因力量薄弱而不得不向西南方向撤退。7日，冈田支队分批爬城而入，第61师1个团拼死抵抗，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被迫撤至固始西面迎河集，固始失陷。

冈田支队攻陷固始后，主力继续向潢川进发。张自忠率第59军严阵以待，主力沿潢河左岸摆开，180师26旅布防潢川以东十五里铺地区、39旅驻守潢川城，38师为预备队驻潢川以西二十里铺以东地区。7日，38师113旅在春河集首先阻击冈田支队，日军以飞机数架、山炮40余门掩护猛烈进攻，连日激战，38师连长以下官兵70余人牺牲。与此同时，日军又向十五里铺第180师26旅进攻，双方激战昼夜。另一股日军向26旅左翼迂回，被击溃。8日，冈田支队从阳关铺向西进攻，在小河桥遭到38师拦击，激战竟日。9日早晨，180师师长刘振三率部在毛集附近，突袭由淮河南岸颍子集窜至上油岗的冈田支队，使之重创，死伤者众。10日，180师又与上油岗日军在陈营子、周寨一带激战，双方互有伤亡。11日，奉命在春河集附近阻击的38师，受到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并施放毒气，左翼阵地被摧毁，224团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其他也伤亡过半，三角店失守。冈田支队另一部在潢川东北面的储河集进攻180师，攻陷黄内寺。

12日，180师和38师在黄寺岗与官渡之间重新布防，日军以飞机掩护，步兵与炮兵联合部队2000多人向官渡猛攻，180师顽强抵抗，击毙大批敌军，冈田支队被打得精疲力尽，伤亡加上患病不断增加，战斗力下降，后方也补给不继，粮弹告急。13日，第10师团攻占31师、77军的樟柏岭阵地。

14日，濑谷旅团及重炮部队驰援官渡，在黄冈寺附近与冈田支队会合，以猛烈炮火轰炸伞陂寺，同时步兵、骑兵1000余人分别进窜余店、毛围孜和牛岗附近，180师与之展开血战。此时，小河桥、三角店一带阵地已被日军突破。15日，第10师团主力与伪军刘桂棠部2000余人溯河西上，迂回至潢川西北地区，攻占息县，一方面南进罗山或西犯信阳，更主要的是

图谋断第59军后路。张自忠乃令38师分两路向北面敌军进攻，一路从潢川北十五里铺出击，以阻敌于息县与潢川之间；一路向二十五里铺出击，以牵制西犯信阳之敌，38师向第10师团猛烈出击，战况十分激烈，呈胶着状态。

16日，日军向潢川城发起正面进攻，潢川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第10师团在战机配合下，大举进攻潢川城，180师和38师在城西南、城东北与之鏖战。与此同时，日军攻至信阳至潢川公路附近，包围第27军团指挥部，军团长张自忠率部拼死冲杀，调38师一部夹击日军，令第59军增援潢川。17日，日军以2000步骑、炮6门进犯西关。危机时刻，张自忠率军部和刘振三率180师毅然入城，与守城官兵一起战斗，士气大振。下午3时，敌以更密集炮火攻城，同时大量施放毒气及烟雾弹，潢川城烟雾弥漫，守城官兵多数昏迷，180师师长刘振三两次中毒昏迷。张自忠令军需处给每人发日光皂2块和白毛巾1条，以毛巾浸吸肥皂水掩鼻坚持



日军进攻潢川县城

战斗。下午5时许，西关城墙被炮火轰塌，日军蜂拥而入，国军与之发生巷战，自团长以下官兵悉数上阵，抱着誓与潢川共存亡的决心殊死搏斗。“敌以炮火、毒气，全线开始猛攻，该部攻守兼施，自军团长以次，莫不身先锋镝，抱必死之决心。敌乘炮火之效果，冲入城内，巷战肉搏，迭次逆袭，一再击退，倭尸累积，壕水尽赤”。（《军令部致孙连仲、冯治安、卫立煌、于学忠、张自忠特急电》（1938年9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07936（2））。夜晚11时，日军后续部队纷至，独立第39旅旅长安克敏命令战士掘开城墙，残兵突围撤出。18日，据守潢川的180、38师坚持与日军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奉命退守经扶、光山，潢川城陷落。

潢川保卫战，张自忠第59军孤军苦战12昼夜，歼敌3000余人，自身伤亡4000多人，日军也不得不承认，“皇军在潢川方面曾遭遇到华军强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潢川保卫战为信阳、正阳关集结布

防赢得了宝贵时间，张自忠因此被委任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并受到蒋介石通电嘉奖：“该总司令、军团长等与荻忱或系久同袍泽，或则夙共疆场，闻鸡起舞，当与媲美，思齐之念，岂甘让着先鞭？务须严整纪律，振作精神，并须彼此切实联系，团结互助，协同动作，共灭敌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P737）。

信罗战役

如前所述，9月6日冈田支队占领固始后，以一部留在固始，主力则向潢川进军。留守固始的冈田支队并未久留，第2天即向光州进击，在击败途中拦截的国军之后，12日达到黄冈寺，14日与第10师团主力会合，作进攻光州的准备。15日，冈田支队和炮兵主力沿大道自东面、第10师团主力则绕过光州北面自西面分别进攻光州，打败在光州及其附近的第28、61、180师及骑兵第9师等守军，17日占领光州。据日军战报，商城—光州战斗，国军损失十分惨重，阵亡官兵12000人，被俘450人，被缴迫击炮13门、轻机枪85挺、重机枪14挺、汽车3辆。日方战死550人，负伤约2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第四节《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军攻占信阳和突破大别山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303）。

第10师团占领光州后，立即命令冈田支队向罗山方向追击。守卫罗山的为川军第45军，以125师担任罗山以东竹杆河防御，124师亦置于罗山城附近。18日，冈田支队前锋第39联队进至淮河边，在蒋料村及淮

河大桥两端桥头堡遭到125师顽强阻击。激战中，桥东阵地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大部，但日军多次抢渡皆被击退。晚间日军攻过大桥，占领竹竿铺附近村落。125师375旅的一个团越过竹杆河大桥，企图偷袭冈田支队，但中了日军埋伏，队伍被打散，损失惨重。19日，冈田支队对竹竿铺地区发动进攻，遭到第45军、第124、125师的联合阻击，打退多轮进攻，双方各伤亡四五百人。日军施放毒气，125师一个旅伤亡过半退守西岸，日军得以突破竹杆河。20日，第10师团主力冒着大雨，进至罗山县城城下，冈田支队则从竹竿铺迁回到罗山西南面的小罗山。第124师750、379团在横山坡迎战来敌，124师师长曾甦元亲临前线指挥，给予日军很大杀伤。日军使用毒气，国军亦有很大伤亡。小罗山战斗，从当日下午3点打到夜晚，阵地被突破后通过激战失而复得，但旋即又失守。晚间，日军突破南门挹秀门进入罗山城，124师师长曾甦元在征得第45军军长陈书农的同意后，放弃罗山城，转移至城西南二三里子路河以西栏杆铺山地。21日上午，日军主力进入县城，罗山失陷。

罗山一役，仅3日便遭失陷，蒋介石大为恼火，直到一年后在西安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检讨武汉会战时，仍要对第45军124师弃守罗山追责。第45军也感到冤枉，当8月19日日军以猛烈炮火攻击任岗阵地时，124师前沿部队要求后方炮兵开炮还击，但这时胡宗南已把炮兵撤到信阳城附近了，致使日军在炮火掩护下逐渐接近并夺取阵地。经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出面说项，蒋介石才应允给曾甦元记大过二次并戴罪立功了事。

罗山失守，直接威胁信阳安全。9月24日，蒋介石密电李宗仁要求“以胡宗南及

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先击破由豫南方面包围之敌，并确保信阳，使武汉附近作战部队容易”。（《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 1938 年 9 月 24 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34）。同时令胡宗南、于学忠发起侧面攻势，先击破豫南方面包围的日军。胡宗南根据蒋介石指示，命令第 1 军在罗山西南展开，第 1 师第 1 旅附

属炮兵第 15 团、战防炮营在小罗山张湾一线占领阵地，以第 28 师进占罗山县城以西的八里棚，支援第 45 军，以稳定罗山阵地。

从 9 月 22 日起，国军不断展开行动，持续打击占据罗山的第 10 师团。25 日，对盘踞在小罗山的冈田支队予以猛烈攻击。26 日，在罗山西面栏杆铺南北之线占领阵地，炮击冈田支队，并在小罗山顶及东面山脊及东南面朱湾附近展开反击，日军施放了高浓度毒气。28 日，在战机配合下，从各个方向向冈田支队发起攻击，冈田支队勉力招架。第 10 师团主力自潢川出发予以增援，对包围冈田支队的国军从南面迂回，向罗山推进。29 日，第 1、28、124 师继续围攻冈田支队，日军陆军第 1 飞行团司令部进驻潢川。30 日，国军与冈田支队继续在罗山对峙，并出动 20 余架战斗机、轰炸机轰炸日军阵地。胡宗南第 17 集团军在第 10 师团主力攻击下退回信阳，日军击破子路河、酆家店、青山店、朱堂店、涩港店附近的守军后，向信阳南面迂回突进。守军的持续反攻，使日



日机轰炸信阳

军遭到重大损失，中方资料显示，日军被歼 5000 余人。

进入 10 月，日军加大了对罗山—信阳的攻势，由青岛、上海各急调一个旅团至六安集结，向罗山、信阳方面急进增援。国军坚持在罗山抗敌，与冈田支队对峙，日军称：

“云集于罗山附近之敌，抗战意志旺盛，与占优势的炮兵与飞机巧妙联络，执着地进行抵抗。”交战 10 余天后，“在罗山外围数公里之地设置坚固阵地坚守”，而日军“自进至罗山以来，东奔西走接敌，不遑休养整备”。（参见李少军：《武汉保卫战史事日志（军事卷）》，武汉出版社即出）。2 日，日军第 2 军司令长官东久迩稔彦，命令到达潢川的第 3 师团向罗山北面地区推进，加快对信阳东北地区的进攻，策应第 10 师团与国军主力交战。3 日，167 师师长赵锡光致电蒋介石，报告该部一个旅自 9 月 26 日奉命据守罗山至信阳公路以北地区黄湾、丁湾、李冈、杜湾一带阵地的一个团，屡遭日军猛攻，仍击退敌军。该团阵地几乎全部被

日军炮火摧毁，官兵伤亡 1400 人，但仍未放弃阵地。（《赵锡光致蒋介石、徐永昌密电》1938 年 10 月 3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787-07976）。

面对日军的进攻，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分析战局，向蒋介石提出重新布署大别山战略的建议，认为日军将由新店、沙窝方面南下，突破大别山脉，使其攻略江北进展容易；其主力将向罗山西进攻信阳，截断平汉路，分别从新店、大新店趋黄安、广水。相应所作部署是：以左翼兵团各部固守大别山脉各隘路，并准备以有力部队随时出击，以牵制日军西进；以胡宗南兵团主力在罗山与信阳公路侧击南下日军，如日军大部西进，则避免决战，利用五里店、信阳阵地逐次拒止该至，并在罗山与固始之间地区召开游击战，袭击日军侧背，指挥民众武力截断其交通。（参见李少军：《武汉保卫战史事日志（军事卷）》，武汉出版社即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吸纳了李宗仁的建议，临时调整了部署，5 日，第 19 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奉命扩编为第 5 兵团（即豫南兵团），指挥第 12 军、第 13 师、第 17 军团、第 16 军、第 106 师、第 31 军，担任平汉路及信阳方面的作战，阻止敌人继续西进。6 日，日军第 10 师团第 10 联队攻占信阳南面的朱堂店，第 63 联队在青山店集结兵力后向朱堂店推进，师团直属部队进至涩港东面地区，濂谷支队进至信阳南方 20 公里处的柳林镇，截断平汉线南段以及南北国军的联系，信阳至武汉间交通中断。为收复柳林车站、恢复平汉线交通，国军调动 5 个师连日反击，但最终未能收复。7 日，濂谷支队向信阳进攻，骑兵部队进至朱堂店附近。9 日，第 3 师团攻陷信阳东北面洋河镇。10 日，第 10 师团

主力攻占信阳西南浉河右岸高地。11 日，截断平汉线北端。同一天，冈田支队突破栏杆铺、五里店等阵地，西进至信阳东 25 公里处，与此同时，第 10 师团主力进至信阳南侧。12 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下达命令，要求第 2 军确保信阳附近，其他部队向汉口西北地区推进，与向麻城方向的日军相呼应，歼灭江北当面敌，攻占汉口与汉阳。第 2 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遵命，令第 10 师团向京汉铁路以西德安方向疾进，第 3 师团确保信阳附近（日本参谋本部《支那事变陆战概史》，P347）。12 日晨，第 10 师团到达中山铺，先头骑兵部队到达十八里庙。下午，冈田支队向信阳城发起进攻并很快占领信阳城。之后第 3、10 师团继续进攻信阳南、北地区，并向柳林镇增派第 63 联队第 3 大队，次日继续增派第 40 联队，双方展开争夺战。

日军占领信阳后，第 10 师团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向武汉进犯，国军于平靖关、武胜关等地设防，以期阻止日军南下武汉。第 39 军从李家寨向平靖关移动，第 28 师向九里关移动，第 68 军驻守武胜关，第 84 军驻防平靖关。17 日，第 10 师团在第 3 师团 3 个步兵大队、1 个炮兵中队的协同下进攻平靖关，国军多部在平靖关附近的谭家河、大庙畈予以阻击。21 日，第 2 军第 3 师团上村支队一部越豫、鄂省境，进至平靖关西面新店。22 日，冈田支队从平靖关西面迂回，从花山进入湖北；第 3、10 师团主力向应山和花园方向突进。23 日，冈田支队进至武胜关西南龙泉镇，于 24 日攻占应山县城，随后第 10 师团攻击武胜关。国军奉命撤出武胜关和平靖关地区。28 日，濂谷支队和第 3 师团后续部队攻陷平靖关，信罗战役结束。

信（阳）罗（山）战役整整 40 天，虽然以罗山特别是信阳失守而告结束，但日军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损兵折将 5000 余人。信阳战役中，日军战死 550 名，负伤约 1560 名，不过这是日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伤亡当远不止此。中国军队伤亡更大，据日本战史记载，其攻占信阳战斗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 13000 具”。

信罗战役，尤其是信阳保卫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本人重视有加，“欲确保武汉，则黄梅、英山、罗田、麻城以至信阳各部队作战之行动，均有直接之关系”。（《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 1938 年》，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03—204）。

对于信罗战役，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前述次年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仍要追究相关指挥人员责任即是证明。而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于防卫信罗地区的国军主力——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的表现极为不满。有研究论著曾指出，胡宗南曾在 9 月下旬日军占领罗山后西进信阳，指挥所部反攻罗山、牵制敌军西犯颇有战绩。但总体上看，胡宗南表现欠佳，前述 8 月 19 日日军以猛烈炮火攻击任岗阵地时，第 124 师前沿部队需要后方炮兵炮击日军，但关键时刻胡宗南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国军阵地失守。10 月 3 日，当日军兵分 3 路进攻信阳时，胡宗南惊慌失措，全线后撤。不然最高统帅部不会临阵换将，另组豫南兵团，由罗卓英任总司令，将胡部第 17 集团军编入其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直属部队，胡部兵壮将强，装备精良，但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这无疑是信阳很快失守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麦金龙对此曾有过较为精辟分析：

9 月 30 日，这支日军终于到达平汉线上的信阳。中国方面希望胡宗南部在该地发起大规模阻击战，以便掩护李宗仁疲惫不堪的广西部队进入西部山区。然而，胡宗南和他的部队却在北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在没有进行任何战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信阳。李宗仁，这位战区的总司令，在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然而对胡宗南却无可奈何。因为，胡宗南是黄埔系中蒋介石最亲的心腹，而且他官位太高，李也不能对他进行军法处置。（〔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 年，P51）。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良皋抗战时期求学重庆

◇ 张 眺（口述） 雷敏功（整理）

投考中央大学

1942年，我父亲从恩施建始联合高中毕业，参加全省毕业会考。湖北省依据会考成绩选拔约30名学生保送上大学，近三分之二的名额分配给建始高中。为什么呢？因为这所高中由湖北多所顶尖中学合并而成，不仅师资力量雄厚，生源质量也极为优异，例如父亲就读的湖北省一中、宜昌高中（今宜昌一中）都在其列。

在毕业会考中，父亲斩获全省第二名的佳绩，数理化、英文、国文几近满分，反倒是难度相对较低的历史扣了几十分。整个高中阶段，他的成绩始终稳居全校榜首。成绩公布后，父亲反复回忆，确认答题并无疏漏，

推测极有可能是老师登分时出现失误，漏了一页试卷，让他“屈居第二”。

父亲被保送至重庆中央大学水利系。从恩施到重庆路途遥远，正值战乱，加上囊中羞涩，无力承担正规轮船的高昂票价，只能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等他抵达重庆，早已错过新生报到时间。后来，经湖北省政府与中央大学沟通协调，学校同意保留学籍一年。

父亲同时考取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但最终无奈放弃。一方面，浙大位于贵州遵义，路途遥远，他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更无力承担路费；另一方面，中央大学当时在亚洲排名第一，全球位列前50，且不少同窗都在该校就读，这让父亲更倾向于中央大学。权衡之下，他决定申请保留中央大学学籍，先工作一年积攒生活费，再继续学业。



1946年夏，中央大学校门口建筑学系学生合影，最高一排中为张良皋

在陪都重庆，生活成本高昂，立足不易。1942年秋，父亲成功考取重庆市农本局（类似今农业局）公务员。求职期间，父亲不仅自己顺利通过考试，还热心帮助了中学同学王福仁。农本局要求应聘者提交自传，以此了解个人经历并考察公文写作能力。王福仁深知父亲文笔出众，便请他代笔。父亲发挥写作特长，将王同学家中的悲惨遭遇写得情真意切。这份自传上交后，王福仁毫无悬念的被录用。

工作之余，父亲坚持复习功课，还广泛阅读各类课外书籍。农本局因主管农业，物资相对充裕。父亲早年在鄂西求学，初中就读于宣恩，高中在建始，生活条件艰苦，长期一日三餐仅以玉米果腹，有时甚至连盐都难以保证，营养严重匮乏。来到农本局后，伙食极大改善。因此父亲常说这段时光，对他而言是难得调养身体、补充营养的阶段。

从湖北流亡至重庆的同学格外团结，彼此互帮互助，堪称“患难之交”。有位汪海仙同学，在重庆一中任教，同学中无论是准备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还是急于寻找工作

的，或是无处落脚，他都热心相助，安排大家住在一中的办公室里，还为每人提供一张课桌用于夜间休息。父亲身高1米75，办公桌仅有1米2长，可在那时，有个能躺下的地方就已足够。夜晚蚊子猖獗，但父亲常说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毕竟在鄂西上学时，蚊子、臭虫、跳蚤、虱子横行，重庆的情况没那么糟糕。

一个看似偶然却又充满必然的契机，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一天，父亲前往中

央大学拜访老同学徐期瑞，交谈中对方用激将法说道：“张良皋，你成绩这么拔尖，还用得着保送？你晓得不，在中大，保送生常常被人另眼相看，总怀疑里面有什么猫腻，是不是靠关系进来的？”这番话激发了父亲的好胜心，他当即决定放弃保送资格，凭借真才实学参加中央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

不过，父亲在选择报考专业时犯难。徐期瑞建议道：“你数理化功底扎实，画也画得不错，我带你去建筑学系看看吧。”参观完建筑系的课程设置和老师、学生的设计作品后，父亲眼前一亮，立刻被这个专业深深吸引，当场决定：“好！明年我就来考建筑系！”

当中央大学放榜时，有同学看到了父亲的名字，立刻跑来向他道喜：“哎呀，上帝青睐你，考取了！”

父亲首先来到工学院接受院长面试，很快便通过了。随后，他又前往建筑系，接受系主任的考核。系主任鲍鼎先生，一听父亲的口音，便关切询问：“你老家是湖北哪里的？”原来，鲍先生是湖北蒲圻人，两人随

即用家乡话交谈起来，满是亲切。然而，父亲却陷入了焦虑与不安。鲍先生问他“你有什么特长？”在父亲看来，报考建筑系理应回答“我会画画”，毕竟建筑专业绘图是基本功。可他却不敢贸然应答，虽临摹过《芥子园画谱》，但并非绘画科班出身，生怕鲍先生当场要求作画，在这位大教授面前露怯。于是回答：“我喜欢数理化。”

鲍先生又追问还喜欢什么科目。其实，父亲自小文采出众，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被同学们视为大才子，此时本应提及己所擅长的国文。但他却鬼使神差地回答“英文”。那时的他并不知晓，鲍先生正是留学美国的高材生，只是微笑点头，并未考他英语。想来，鲍先生深知流亡学生求学的艰辛，对父亲这样能高分考入中央大学的小同乡，心中满是体恤与关照。

不久，父亲收到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这一年是1943年，父亲刚满20岁，自此踏上了新的求学征程。

在中央大学求学

“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最后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安了“新家”。

父亲刚进中央大学那会儿，大一新生都得去距沙坪坝本部差不多30里的柏溪分校。分校在山坡上，得沿石板路往上爬。最有意思的是，分校最高处是饭厅，和本部松林坡最高处的图书馆遥遥相望，同学们都打趣说“柏溪以吃饭为要务，沙坪坝以读书为中心”。可这饭啊，真不好吃！掺着谷子、砂子、稗子，有时还能看见老鼠粪，大家都管这叫“八宝饭”。菜，也就是榨菜、空心菜、豆腐这些。要是哪天能吃上白馒头，那简直跟过年一样！就这条件，每到饭点，大

家还是拼了命往前冲，慢一步都得饿肚子。但我父亲心里清楚，这读书机会多难得啊，再苦也得咬牙坚持。

建筑系新生的学业压力，现在想想都觉得吓人。中央大学有个规定，大一基础课没学好就得留级。面子上挂不住不说，还得和其他同学分开，学习氛围、人际关系全变了。所以大家一个个跟拼命三郎似的。就说我父亲，硬是凭着一股狠劲儿，微积分考了全系第一。美术课对他来说还算轻松，毕竟小时候临摹过《芥子园画谱》，可水彩画成了他的噩梦。他在恩施穷乡僻壤读中学，彩色笔都没见过。美术老师李剑晨先生，带着浓浓的河南口音打趣说“张良皋就是个色盲”。不过我父亲后来“开窍”，这些难题都一一攻克。

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前50。说起建筑系的老师，那可都是“大咖”！系主任鲍鼎先生，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和梁思成先生齐名，业内称之“北梁南鲍”。童寯、杨廷宝先生这些专业老师，全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带来的都是世界前沿的建筑理论。

这些老师不仅理论厉害，动手能力更是一绝。有一回我父亲在教室画图，童寯先生进来瞅了两眼，啥也没说，接过笔唰唰画出几张不同风格的草图，把我父亲他们都看傻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徐悲鸿先生还来教过美术课。有这些国宝级的顶级大师传道授业，学生的学术素养能不蹭蹭往上涨吗！

中央大学有个特别棒的规矩——学生能去所有教室听课。我父亲可把这“福利”利用到极致，一有空就去旁听非本专业的课。因为鲍鼎先生常说，好的建筑师就得是通才。那会儿红学大师吴世昌先生在学校任



1944年底 张良皋在重庆嘉陵新村



1947年春，张良皋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



1947年6月，张良皋大学毕业照

教，我父亲也去蹭过他的课。谁能想到，这段经历在“文革”期间还派上用场。我父亲属于“逍遥派”，在建筑设计之余，埋头研究《红楼梦》，自嘲自己是“又红又专”。

沙坪坝本部环山而建，和重庆大学挨着（重庆大学划给的部分校园），七个学院加一个研究所，3100多学生挤在这儿。教室和宿舍都绕着山坡，学习生活全搅和一起，有个“四抢”的说法：抢图书馆座位、抢教室前排座位、抢饭桶、抢水用。图书馆座位就那么几个，可大家都想看书，每天开馆跟打仗似的往里冲；教室前排能听得清楚，自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时物资紧张，饭和水都得靠“抢”。

当时，日军把中央大学当成轰炸目标。一拉警报，就往山丘里的防空洞跑，里面又黑又挤，啥也干不了，只能提心吊胆地等着。可警报声一停，图书馆和教室立马被学生填满，争分夺秒学习，读书风气比平时还浓！教授也不含糊，该咋上课咋上课，一心想着教育救国。

虽然日子艰苦，但师生心里都揣着一团火。大家主要靠政府的公费和贷金过日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大褂，脸都因为营养不良发黄，可眼神坚定，一门心思想着用知识建设国家。

学习再紧张，大家也会给自己找点乐子。重庆文艺活动可热闹了，中国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经常借学校礼堂演话剧，《日出》《雷雨》《屈原》这些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市民和学生都抢着去看，这可是大轰炸阴霾下的一抹亮色。校园里还不时举办音乐会，《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爱国歌曲一唱起来，大家心里的劲儿都被点燃了，互相鼓劲，谁也不喊苦。

我父亲住在沙坪坝的宿舍，二三百个学生挤在统舱式的上下铺，连张书桌都没有。可就这么个简陋的地方，却让同学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毕业后，校友见面，哪怕以前并不认识，立马“他乡遇故知”，聊得亲热无比。这同窗情谊，是那段艰苦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



1945年暑假，昆明炮兵训练中心，中央大学建筑系校友来访

“我曾是二战翻译官”

1943年秋，意大利在欧洲战场投降，亚太战场盟国筹备对日反攻，大量美军来华，翻译需求激增。国民政府下令征召大学四年级男生入伍，拒绝者不发毕业证。冬季，美军深入到中国军队的连队协助训练作战，对翻译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仅大四学生已无法满足，于是面向社会征召。

1944年秋，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进入攻坚阶段，中央大学500多名学生响应号召参加远征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成为全国高校中参军人数最多的学校，校长顾毓琇亲自为学生送行。

正上大二的父亲和同学华冠球毅然报名参加驻印远征军，在重庆鸳鸯桥教导第三团接受军训待命。训练期间因名额满员，教导三团解散，华冠球选择返校，父亲却不愿放弃从军抗日的机会。

父亲决心如此坚定，是因为日寇侵华，让他最小的弟妹双双失去，心中怀着国仇家恨。早在中学时期，他就曾多次报考军校，

却因个子瘦小未被录取。此时，他认定这是报仇雪恨的绝佳时机，绝不能无功而返。

父亲报名考入军委会外事局重庆译员训练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从陈纳德飞虎队援华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先后共征调近5000名译员参战，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译员训练班的老师个个资历不凡。美国教员中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译者毕范宇博士，中国教员中有当过蒋介石英文翻译的王锡钧、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彭乐善博士等，他们轮流到各个小组（15人一组）教口语，为了让大家适应各地口音的英语。

译员训练班是典型的美式高强度训练，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有次父亲听到隔壁有人吵架，竟下意识用英语去听，“哎呀，糟糕，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这可把他急坏了，听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原来人家是用地道的四川话吵架。

译员训练班结业那天，身为中央训练团团长的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训话。分列式后，蒋介石照例亲自点名，结果错将我父亲的名字念成了“张良举”，我父亲当场纠正：“报告！我叫张良皋！”蒋愣了一下，更正道：“张良皋。”这一下把大队长吓得脸色发白大汗淋漓，事后一个劲责备我父亲：“你，你小子，你怎么敢纠正他呀！”我父亲心里说：“我的姓名权可不容侵犯。”

毕业后，父亲被派往云南昆明城东25公里的大板桥炮兵训练所，这里原是滇军军营，附带小机场，供炮兵联络机起降。初到之时，译员宿舍紧缺，多数人只能挤在帆布帐篷里。昼夜温差大，白天帐篷里闷热得像

蒸笼，夜晚又冷得人直打哆嗦，但没人抱怨。

炮兵训练所采用美式高强度训练模式，每一批中国官兵需在6周内掌握105毫米榴弹炮操作。父亲所在的战炮连，每天天不亮就要集合，扛着沉重的炮管、炮弹进行体能与实操训练。美国教官要求严苛，每个动作、每项流程都必须精准无误。比如装填炮弹，从取弹、擦拭、校准到推入炮膛，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稍有迟缓就会被严厉训斥。

在训练所里，中美官兵的待遇悬殊。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美国官兵喝牛奶，吃正规快餐，执勤时吃豆子罐头、牛肉罐头和补充体力的大块巧克力，有时还可以抽到香烟。而中国士兵大多营养不良，体格远不如美国人。一门榴弹炮，美国人8人一组，中国人十几个人一组，还常常搬不动。

由于对美国人轻视中方译员的态度不满，译员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经过抗争，译员身份得以正名，确认为军中文职人员而不是“雇员”。从此，美军人员不再随随便便称呼“interpreter（译员）”，而是不嫌麻烦地称“interpreting Officer（翻译官）”。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但他们不喜欢歪戴的美式船形军帽，自己上街去买一顶中国软边军帽。这支队伍形成了独特军容：一身美式军装，却戴中国军帽。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来，大家纷纷涌进大操场。炮兵训练所有很多信号弹，美国士兵也顾不上请示上级，纷纷打开信号弹库，一时间，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胜利焰火点得通亮。



2009年，张良皋佩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参加活动

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遣散译员，我父亲编在第二批，于10月11日从昆明出发，21日抵达重庆中央大学。

2002年，我父亲应邀去美国讲学。当时“911”刚发生不久，申请签证表格有一栏问：是否会使用武器？父亲是这样填写的：“会操作105榴弹炮。”面对美方签证官疑惑的眼神，我父亲自豪地告诉他，“我曾是二战盟军战地翻译官”。美方签证官微微一笑，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了。他们对于二战老兵非常尊重。

张眺，张良皋先生女儿，退休前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教师；雷敏功，退休前任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汉阳龟山赤壁画馆

◇ 张智海

赤壁画馆全称“赤壁大战全景画馆”，为汉阳龟山三国城主题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景点，1999年12月20日开馆接待游人。

赤壁画馆承载世界一流壁画艺术珍品，为武汉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作为一个与之有过交集的老城建工作者，不由回想它的建设过程，也体会它的艺术价值。

赤壁画馆名扬中外

赤壁画馆是一座双环形天坛式建筑，高25.8米，外径53米，内径45米，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644平方米。馆内“赤壁大战”环幕壁画，净高18米，周长135米，整体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其艺术成就和价值，可与享誉世界的埃及《六日战争》、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比利时《滑铁卢之战》等全景画媲美。

赤壁大战全景画，表现的“火烧赤壁”之战。当时全球共有二十几幅全景画，其中

6幅在中国，“赤壁大战”是此类艺术的巅峰之作和唯一历史题材。全景画以东吴赤壁发兵为序，至曹操败走华容结尾，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展现将士100多万人、战马1万多匹、战船5000多艘、古树9000多棵、乌鸦3万多只，其他兵械、景物、设施不计其数，场面宏大，气势磅礴。

“赤壁大战”声光电并用，集绘画、地



赤壁画馆远眺（2019年）

面塑形、仿真道具于一体，融灯光、解说、音乐于一炉。冷月江天，枯荻哀鸿，旌旗猎猎，营帐楚楚，两军对垒，刀光剑影，火烧战船，烈焰腾空。战马的嘶鸣声，三军将士的喊杀声，伴之以鼓角惊雷频频传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逼真的临场感，使坐在旋转平台上缓缓移动的观众惊心动魄，仿佛置身于那场鏖战之中。

赤壁大战全景画的问世获得广泛赞誉。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国徽设计者、老艺术家张仃及著名画家侯一民、范迪安等认为，“赤壁大战”全景画是国内少有的杰作，在国际上也属珍品。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张世彦说它是中国壁画史上的扛鼎之作，著名书画家孔可立称其为瑰宝和划时代的国宝级艺术品。

国际壁画艺术界人士也予高度评价。2001年10月，世界全景画学会理事会主席G·streicher博士（德国），率7名委员专程来汉参观赤壁画馆，称颂画作艺术水平世界一流，是其所见过的唯一一幅将艺术想像力与历史事件巧妙结合的力作，达到现代绘画作品的最高境界。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列宾美术学院教授贝斯特洛夫，来汉观赏此画后赞叹不已，说它是世界少有的艺术精品。

这幅华夏无双，展现中国画家智慧和力量的旷世佳作，当之无愧荣获全国首届壁画展大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赤壁画馆来之不易

赤壁大战全景画创作历时两三年，分为画稿创作和现场创作（绘画）两个阶段，创作者呕心沥血备尝艰辛。



赤壁大战全景画局部

1995年秋，鲁迅美术学院承接赤壁大战全景画创作任务。老院长宋惠民和李福来、任梦璋、王希奇、王铁牛等10多名画家，深入赤壁、乌林、华容古道、荆州古城等“三国古战场”考察，拍摄7000多幅照片作为创作素材，最终确定蒲圻赤壁、洪湖乌林为再现赤壁大战的场景地，先后七易画稿。

全景画的现场绘画用了近一年时间，先后有32位知名油画家和艺术家参与。为了让画中人物、服饰、战船、兵器 and 兵法、阵法、营法、行军法经得起推敲，主创人之一李福来研究、参考60部兵书，给画家上了一星期的兵法课。为了准确表现当夜的月光，他还在那年夏季的40多天里，每晚扛着60倍的望远镜，在龟山上观天望月，记下月位月相。

全景画通长135米，高18米，相当于六七层楼高，现场绘画配有架梯和可升降移动工作台。开始时，画馆刚刚封顶，水泥、石灰气味呛鼻，画家在封闭的馆内一干就是一天。夏日气温高达40℃，没有空调，又正赶上画天空和云彩，一个个赤膊短裤汗流浹背，系上安全带，攀梯上台登高作画，哪怕手上磨起血泡也不停歇。

几张图片记录了当时创作中的场景：鲁

迅美院院长宋惠民在升降工作台上挥笔，画家一笔一划描绘每一个细部，地面塑形和（道具）置景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握剑持盾的模特穿行现场供画家借鉴……

完成画作耗用油画颜料 3.5 吨、墨水 3 吨、画笔 1280 支，不难揣测工程之宏大。

全景画须用质地密实的整幅亚麻画布，画幅 18×135 米这么大尺寸的画布，寻遍全国也未能找到。后请上海纺织十八厂协作，组织科技攻关，用了半年时间，终以特殊工艺即 18 台织机同时操作，一次整体织造成功，创下了前无古人的奇迹。画布重达 2 吨多，辗转运抵现场，安装就位，展平收紧，费尽周折。宋惠民说，赤壁大战全景画至少可以保存 200 年。

赤壁画馆建设总投资 5700 万元（含壁画创作绘制费 400 万元），由东建集团筹措。赤壁画馆包括建筑主体与辅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分别由武汉市园林设计院和东建集团承担。由于这里水文地质复杂，山脊陡峭，其土建、供电、通讯、给排水、消防和道路等，问题很多，难度很大。建设、设计、施工三方通力合作，终于想方设法逐一解决。

笔者之所以钟情赤壁画馆，源于 1985 年在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驻伊拉克办事处工作时，到过卡迪西亚画馆。卡迪西亚画馆在巴格达南 30 公里底格里斯河畔的荒原上。史载公元 636 年 5 月，3 万阿拉伯将士在这里迎击入侵的波斯 6 万大军，创下了以



少胜多的战例典范。萨达姆主政第二年即 1980 年，伊政府以这场战争为主题，特聘平壤画师，耗资创建了卡迪西亚之战全景画馆，成为当时继莫斯科、列宁格勒、布鲁塞尔、平壤之后的全球第五座全景画馆。其全景画高约七八米，长不过六七十米，规模不算大，名气可不小，门票 5 伊第（约合人民币 15 元），观众络绎不绝。登上画馆二层，只见声光电营造的战场硝烟弥漫，环顾栩栩如生的千军万马厮杀，我惊呆了，遐想我们中国何时也能有一座这样的艺术殿堂呢。

十多年后，赤壁画馆在汉阳龟山落成，同为重大历史题材，但就规模、绘画、置景、造型和音响效果，尤其是观众旋转平台的设置，都是卡迪西亚画馆无法相比的。作为武汉市民，我为赤壁画馆的“横空出世”而欢欣，不时就去“亲厚”一下。

张智海，原武汉市城建委副巡视员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五）

◇ 刘宝森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大别山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区域。

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黄（安）麻（城）起义，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等领导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农民、士兵起义，开辟豫东南根据地。同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六（安）霍（山）农民、士兵起义，开辟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



鄂豫皖苏维埃航空局局长龙文光

的商城、光山（含新县）、固始、潢川（后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颍上、合肥等县组建鄂豫皖边特区，建立鄂豫皖特委。

1930年2月16日中午，武汉航空四队飞行员龙文光驾机去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因遇大雾且油料耗尽，迫降在罗山县宣化店西南10公里的陈家河附近菜子坳前面的河滩上。这是一架美国钱斯·渥特(Chance Vought)公司制造的“可塞”(Corsair)02U-4型侦察机，可携带炸弹作轻型轰炸机使用。

龙文光189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崇庆县(今崇州市)廖家乡金马河畔彭家火地(今詹湾村)的一个农家，1924年末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次年6月转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学习飞行，1927年初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派赴苏联学习航空，1928年春回国先后任航空处第一队飞行员、南京中央军校航空班少校飞行教官、武汉航空四队飞机师。

龙文光被俘后，经红一军总指挥徐向前兄长般的促膝长谈，他决定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曾改名龙赤光。随后在红一军总部任参谋。1931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鄂豫皖苏维埃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为政治委员。

航空局位于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北侧的普济寺内，龙文光组织在普济寺外修建飞机场。为执行任务方便，又在黄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皖西的金家寨各修建简易机场。一个航空局，仅一个飞行员、一架飞机，却有三个机场，这也算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观。

为表达对伟大革命导师的敬意，苏维

埃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飞机在平坦的河滩上重新组装起来，涂上灰色油漆，机身“列宁”两个红色大字和机翼两颗红星闪闪发光。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在战火纷飞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1931年7月初，红一军政委陈昌浩乘“列宁号”首航。飞机由新集机场起飞，到英山金家寨航程100多公里，十几分钟就飞到目的地上空。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泥泞，飞机无法降落，“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固始县城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起初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当看到红五星徽记和飞机撒下的传单，吓得争相逃命。“列宁号”又继续飞往潢川、光山进行侦察，返回新集机场安全降落。

9月8日傍晚，“列宁号”从新集机场起飞，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敌巢震动，发布命令实行灯火管制。《扫荡三日刊》(《扫荡报》前身)刊登这样的消息：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1931年11月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北七里坪成立，不久南下围攻黄安。国军第69师师长赵冠英率领万余人固守待援，



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列宁号”飞机

红军久攻不克。总政委陈昌浩决定派“列宁号”参战。

12月中旬的一天，龙文光在“列宁号”装上炸弹架，将迫击炮弹捆绑起来挂在飞机上作为炸弹，轰炸敌军师指挥所及守卫部队。黄安守军待援无望，又遭飞机轰炸，军心更加动摇，赵冠英惊慌中率部弃城而逃。红军乘胜追击，生俘赵冠英部5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黄安城遂告解放。黄安一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有飞机参加的战斗而独具特殊意义。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30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对龙文光“带机投匪”恨之入骨，6月4日，调航空五队飞机6架，协同航空四队进攻苏区。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独立第八师师长郑泽吾奉命将“列宁号”飞机拆卸，分散埋藏于大别山的一个偏僻山沟里。

龙文光与部队失散，改装潜行回武汉看望妻子黄秋英，1932年9月10日被捕入狱。1933年8月9日，龙文光以“带机投匪”罪被判处死刑，时年34岁。临死前，龙文

光挥毫写下就义诗：“千秋风雨世间飘，死生一事付鸿毛。吾为自由空中飞，不算英雄亦自豪。”

在短暂而又艰苦的战斗历程中，龙文光与他驾驶的“列宁号”飞机，在人民空军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1951年9月，王树声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到大别山，当地群众将挖出来的飞机部件献出。

“列宁号”飞机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也是中国航空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架珍贵名机。1990年，为了不忘“列宁号”与龙文光烈士共创的革命战绩，在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金华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成章的赞助下，由飞机模型专家陈应明1:1复制出“列宁号”飞机，陈列于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向后人展示它不凡的历史价值。

张学良与南湖机械学校

1920年，张学良奉父命赴日本考察航空，观看模拟空战，深为日本陆、空军“装备优良、训练有方、技术先进”所震动。

归国后，张学良竭力宣传空军威力，得到其父赞同，扩充东北航空处，发展航空业，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学员。1923年，张学良受命任航空总办，一手创办东北航空学校，一手扩展航空力量。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更加致力于空军和航空工厂建设，下令将东北航空处改编为东北航空大队。1930年春，张学良又把航空大队扩编为东北边防军（航空）司令部并



张学良在武昌就职

兼任司令，拥有法、英、美、德各式飞机10多种300多架，扩建、新建3个飞机场。

1932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张学良命令何柱国部奋勇抵抗，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3月初，张学良负责防守的热河失守，国内舆论沸腾，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背着不抵抗的“罪名”，被迫辞去本兼各职，于4月11日出国游欧。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归国，2月23日抵达武汉。

在武汉期间，张学良誓言恢复东北失地，主张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培养人才，计划于若干年后，建成自己的航空和运输工业。同时，张学良一心整训东北军，准备抗日。他在武昌南湖对112师全体官兵的一次训话中说道：“现在正因为东北被外人武装占领，东北军人所感受的痛苦比较最深，对东北环境也比较最熟悉，所以东北军人的特殊使命是挺身作收复东北的先锋。”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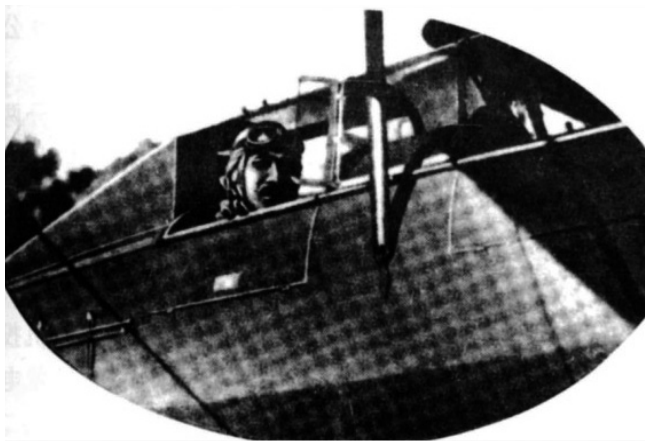
出资建设南湖机场、创办武昌南湖机械学校。机场面积达数千亩，除平整的跑道外，共有建筑物两大处，一处是飞机库，一处是学校。飞机库很宽敞，停放张学良的“搏云号”私人飞机、学校的“瓦口号”教练机，有时冯庸的“赤马号”飞机也存于此。除陈诚的飞机允许在机场降落外，其他任何军、民用飞机均遭拒绝。两端设有不少房间，一端是飞机场场长、美国人施密斯的办公室、宿舍及工作人员办公室、飞机检修车间和学校实习车间；另一端是学校管理员白俄施培申尼夫上校的办公室、宿舍及柴油发电机室和仓库。

学校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为教室、餐厅和图书室，楼下为学生宿舍、浴室和储藏室，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

南湖机械学校由张学良的童年密友、英国人伊雅格全权负责。教授共有20多位，除伊雅格的私人秘书王养溪担任中文讲师外，其他都是从欧美征聘来的专业人才，包



张学良检阅航空部队



张学良驾驶飞机

括张学良私人飞机的正驾驶员 2 人、副驾驶兼机械师 2 人和地勤工程师 1 人，轮班在校任教。另外，武汉大学、华中大学和美商企业聘请来的外籍教授和工程师 3 人，亦按期来校任教。所招收的学生，必须大学毕业或肄业 3 年以上或具备同等学历、25 周岁以下的未婚者，经过笔试、口试合格，才能获得初步录取的资格。在校经过半年试读后，再进行一次大考，合格者才算取得正式入学资格。落选的学生，则由校方提供旅费返回原籍。

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上午在课堂学习理论，下午到车间实习。车间备有整部的旧汽车和旧飞机引擎，可供拆卸、检修和总装，学习效果非常显著。试读期间，学生轮流随飞机出差，主要任务是留守机内以保机身安全，免遭歹人破坏。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大部分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张学良。

1935 年，张学良在甘肃平凉另建一个飞机场，校方号召全体学生利用假期之便，积极赴该地参加基建，担任汽车运输和推土机司机，除照发一切福利外并给予优厚的额外工资。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湖机械学校撤销，

机场被军队接收，学校宣布解散，所有学生送交武昌军法处拘留听候处理。武汉航空站站长金家泗了解学生的专业程度，出于爱才向武昌军法处说情，避免例行的严肃审讯，允许行动自由。蒋介石获释的同时，这批学生也释放出来。当天，金家泗宣布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命令，所有学生均被留用，愿意学飞行的持他的介绍信前往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报到。

参考文献：

- [1] 《胜利密码：解放军战力之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
- [2] 《中国航空图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3] 《张学良与武昌南湖机械学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6》，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大陆村地名溯源

◇ 张 均

大陆村位于汉口铭新街与保成路交叉口东侧，里份规模不大，仅有6栋房屋，呈西南东北走向，西南出保成路，东北通金业里。临近保成路的一栋西式洋房（铭新街8号），现为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使用，1993年挂牌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1年公布为武汉市级文保单位。



铭新街与保成路交叉口的西式洋房，原李华堂公馆

1990年出版的《武汉地名志》记载：1920年代初，大陆银行在此建房成里，用作员工宿舍，故得名大陆村。然而，随着相关资料的深入挖掘，佐以武汉市档案馆所藏的大陆银行档案，先前的说法是需要予以更正的。

大陆村历史说法不一

目前来看，除《武汉地名志》外，关于大陆村尚无专门著述，均是在相关文史著作或文章中有所提及，且内容基本一致，总体上沿袭《武汉地名志》的说法。其共同点是：大陆银行于1924年在保成路与铭新街转角处建成办公楼，并在旁边建起大陆村；办公楼为大陆银行在汉的行址，1927年11月至1929年4月期间，被国民党桂系军队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占用。对1929年4月以后的情况，均未有任何述及。

另一种说法，来自武汉市政府对办公楼

作为优秀历史建筑的挂牌简介，称办公楼于“1923年建成，初为大陆银行行址”“国民党‘宁汉合流’，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设于此”。

由此，关于大陆村及办公楼的来源，形成了地方志书、文史著作和官方认定三种不同表述。三者都认为，办公楼曾为大陆银行在汉的行址，但区别也十分明显。首先，在建成时间上有1923年和1924年两个说法，且《武汉地名志》中没有具体的年份。其次，业主方为谁，官方说法则与其他二说不同，并未明确是大陆银行。最后，在房屋产权归属上也有不同，一说：因大陆银行有北洋军阀冯国璋的背景，办公楼被作为“逆产”征收；一说：只是被征用，产权还属于大陆银行。

由此，要准确弄清大陆村的历史，有必要先从大陆银行汉口分行的建立、发展过程入手。

大陆银行是民国时期主要商业银行之一，1919年4月于天津按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发起成立，经营储蓄、信托、保管、货栈等业务，1922年与金城、中南、盐业银行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被称“北四行”，开展多种联合营业。淞沪会战时期，抗战将士坚守的四行仓库，即为四行联合所建。

1935年币制改革前，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纸币，并设有四行准备库。大陆银行成立之初，得到北洋直系军阀的支持，最初的100万股本（实际收足38万元）中，冯国璋认股20万元，李纯、齐燮元等5人认股10万元。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认股1万元。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银行家谈荔荪，在任14年，经其苦心稳健经营，大陆银行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资本额1000万元，达到鼎盛。

1922年至1931年是大陆银行迅速扩张阶段，在青岛、济南、南京、杭州、无锡等地先后建立16家分支行。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即成立于这一时期。

汉口大陆银行行址频繁变迁

民国时期，汉口大陆银行分支行的行址发生多次变化。

《大陆银行营业报告（1922年份）》《全国银行年鉴（1935）》等多份资料可以佐证，1923年1月，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在汉口保成里开业。根据1933年出版的《武汉指南》，保成里并不在今天的保成路，而是位于新马路（现中山大道）后花楼，具体位置为与江汉路平行的交通路上。保成路此时名为汇川路。

其实，在大陆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前，有过一段办事处时期。从汉口银行公会1923年开展的会员银行调查报告看，大陆银行先在保成里设立过办事处。“去岁十月间，在保成里先设办事处。营业日见发达，即奉总行改为分行”，即1922年10月，大陆银行先在保成里设立办事处开展业务，到次年的1月改为分行，行址依然在保成里。

汉口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于1920年11月，先后借金星公司、中国银行等处办公。1923年11月，银行公会新址（位于汇通路与江汉二路交会处，靠近中山大道一侧）落成，即创办《银行杂志》。《银行杂志》与上海银行公会的《银行周报》、北京银行公会的《银行月刊》并称民国时期三大银行期刊。

《银行杂志》创刊号收录有金世和《汉口银行公会会员调查录》一文，其中记载，1923年3月15日，大陆银行汉口分行从保成里搬入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街（即现江汉路

江汉关附近)营业。

从1920年代大陆银行在《汉口新闻报》刊登的广告看,1923年3月至1927年12月,行址一直都在一码头太平街。1928年5月25日,大陆银行在《汉口新闻报》发布启事,“现因一码头原有房屋租约期满,自十二月十一日起移至法租界公德里十五号办公”。9月10日,大陆银行又在《汉口新闻报》登载迁移广告,“本行于阳历七月一日,迁移至法租界德托美领事街七号(即泰兴里对面)”。从间隔不长的两个广告发布的时间、行文内容来分析,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应是在1927年12月11日,由英租界一码头迁入公德里15号办公。7个月后,又迁到法租界德托美领事街(大致在现胜利街黄兴路口到一元路口一段)。

此后直至抗战前,大陆银行汉口分行行址一直未有变动。抗战胜利后,大陆银行在《武汉日报》发布通告,“本行定于三十五年元月四日,迁至湖北街二十号行址营业”。

除分行外,大陆银行在汉也设立过多个支行、办事处。1930年,在汉口日租界中街30号设立办事处,但不久即撤销。1932年,在湖北街与扬子街转角处开办支行。在1933年3月12日的大陆银行第十四届股东常会上,总经理谈荔荪在报告行务时专门提到,“汉口湖北街为汉埠商业中心,可称汉地最繁盛之区域。本行早有设立机关之意。本行汉口分行设在法租界,以汉口地势言,均认为安全区域,但交通不为湖北街之便利。现在各银行大都均设在湖北街附近,本行为便利顾客起见,故在该

处设立支行。闻开业以来,营业颇为发达,收入存款不少”。1935年,大陆银行在武昌芝麻岭正街(现解放路)设立武昌支行。

可以看出,大陆银行汉口分行行址经历了保成里、一码头、公德里、湖北街时期。支行(含办事处)曾设立于汉口日租界中街(现胜利街陈怀民路口至刘家麒路口一段)、武昌芝麻岭、汉口湖北街等地,从未在铭新街设立过分行或支行、办事处。

对于以办公楼内有地下室而作为大陆银行曾用作金库,佐证其在铭新街建有行址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从现场实地查看,地下室并不在办公楼下方,而是位于办公楼紧邻的五层居民楼地下,应该是与居民楼同时建成,但居民楼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大陆村与大陆银行的关系

那么,大陆村与大陆银行到底有没有关系?大陆村是不是大陆银行所建?

根据1930年汉口市政工务局绘制的《汉口市街道详图》,保成路与铭新街交会处的里份,当时并不叫大陆村,而是标为忠信里。

蔡寄鸥在《武汉新闻史》中明确写道,



1930年,汉口市政工务局绘制的《汉口市街道详图》,标明铭新街与保成路交会处为忠信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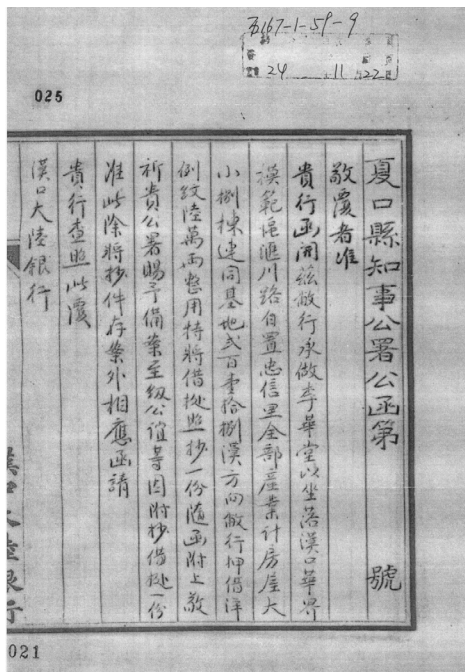
忠信里为李华堂所建。李华堂是湖北安陆人，原为经营布业的商人，与四川督军陈宦为同乡，辛亥首义后，被陈宦延揽为其驻汉的办事处长。1912年，李华堂在汉创办《国民新报》，报社最初设在汉口花楼街博学书院隔壁。李华堂善于利用报纸作宣传，曾做过一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在加印湖北官钱局的官票时中饱私囊发家，“于是乎大兴土木，增高阔间以为荣……在汉口模范区建造了国民新报的大厦和画栋联云的忠信里”。

大陆银行有关档案，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忠信里房产流转变化的资料。

档案显示，1926年7月，李华堂将忠信里8栋房屋（包括李本人所居住的房屋即西式洋房，以及周围的7栋房屋）连同地基218汉方（换算成亩制为三亩八分五厘），抵押给大陆银行1年，借款6万元，月息一分二厘，每3个月以房屋租金抵付。相关契约在夏口县知事公署也作了备案，知事公署出具了《关于汉口大陆银行承做李华堂以房产押借例纹银事宜的公函》。其中明确写到，忠信里为李华堂自置产业。然而，李华堂在借款后，第二期应付利息就出现逾期。

北伐军进驻武汉后，国民革命军第15军司令部（即刘佐龙部）看中忠信里房屋，李华堂向其说明房产已抵押大陆银行，第15军遂向大陆银行发出《关于商借忠信里住宅办公等事宜的函》，于1926年10月23日进驻忠信里，作为其办公用房。1927年6月，第15军开拔后，房屋还未及收回，又被武汉卫戍司令部以“逆产”名义没收占据。大陆银行将房屋受押情形报武汉卫戍司令部，被其“批令呈候省政府核办”，在向省政府备案后，收到了《湖北省政府关于汉口大陆银行呈为保障民房转咨备案的批》。

根据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5月10日颁



1926年，夏口县知事公署出具《关于汉口大陆银行承做李华堂以房产押借例纹银事宜的公函》

布的《处分逆产条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处理逆产条例》和《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有关条款，大陆银行与省、市政府以及民、财两厅等负责处理逆产的官署进行了反复交涉。

1932年，湖北省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原没收逆产变更处理四项办法。“原没收各案逆产有因时过境迁在事实上无可发还者，依照中央法令。凡已经处分或原状不能回复者，[按]不发还之规定办理。又以各该案负有公家债务纠纷，应由各该财产所有人自行清理”。

1932年《湖北民政刊要》第1期，发布《会同财政厅布告变更处理各逆产由》，明确记载，李华堂所有的忠信里房屋要予以变更处理。至9月，忠信里房屋得以发还，但仍被军政机关和人员占据。12月6日，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向总行总经理处报告忠信里8栋房产的具体情况，“第12678号

为三省剿匪司令部运输处（第7号用一半）借用”，“前系由湖北绥靖公署借与运输处”，“第3号为循实中学所用”，“系蒋鼎文师长所指定借住”，第4号被八十五师办公处占用，第5号系由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吕、袁两姓人员居住，“第7号半为毛姓所用，毛系第十一师副官”，“系向第十一师罗楚英副□借住”。同时附有示意图，详细标明了房屋被占据使用的情况。

几经周折，1933年7月，直至最后占据忠信里的水警总局迁出，大陆银行才真正收回，此时“李家依然无力清偿债务，经几度洽商之结果，始决定由李家将该产之所有权移归敝行，另由敝行体谅李家之困难，赠给津贴四千元”。忠信里自此成为大陆银行的房产。

鉴于房产抵押带来的麻烦纠纷，1931年3月17日，大陆银行总经理处发出《通告禁止叙做不动产抵押放款希查照》，其中讲到，“嗣后，关于不动产押款，除沪储信部原有规定并准其将十八年修正之不动产抵押规则参酌办理外，其余各行一概禁止叙做，至从前已做之不动产押款均望于到期时收回结束”。

1933年8月，大陆银行将忠信里租借给银行公会办公。因涉及房捐，此情况被汉口市税捐稽征处调查十分清楚。在《汉口市税捐稽征处关于铭新街第46号房屋自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起至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止银行公会居住期间房捐免征的公函》中记载，“该铭新街第四十六号房屋（即忠信里五号），其二三两层全楼，原由水警总局借住，迨二十二年七月迁出后，银行公会复于二十二年八月迁入”。

1934年3月至1935年3月，忠信里内的西式洋房复租于汉口营业税局，作为其办

公楼。1934年11月，大陆银行向汉市公安局递交《关于忠信里及新兴里改名的呈》，呈请为忠信里更名，“为避免将来纠纷而一新耳目起见，拟将忠信里改名为大陆村”。12月，汉市公安局批复“准予更改”，忠信里由此更名为大陆村。

武汉解放后，忠信里除加盖的两栋房屋，原有房屋均保留了下来。只是因门牌管理变化，忠信里原沿街房屋改以铭新街或保成路编号。

抗战胜利后，1946年办公楼租与律师事务所，租期3年。大陆村其他房屋也分别租于他人。1950年6月17日，汉口大陆银行将大陆村房屋连同地皮售予武汉市财政局，“产价二道机米五千七百石，其中二百石照付机米，五千五百石于六月十七至二十八日，分别按照各该日牌价（均为拾五万陆千元）折付人民币”。

从上述的大致脉络来看，大陆村原名忠信里，由北洋政客李华堂所建，后将其抵押给大陆银行，又曾被认定为“逆产”被军政机关占据，在产业发还后，因李家无力偿还本息，最终成为大陆银行的产业。由此表明，大陆村既非大陆银行所建，也从未做过行址，且房屋并不由其职员居住，而是一直对外出租。那么，现有的三种说法，或多或少与历史事实不符。

张均，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编审处处长，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成员